

上海港码头的变迁

www.80xiu.com

上海港码头的变迁

《上海港码头的变迁》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2,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71·215 定价：0.24元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解放后，上海港码头上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解放前的上海港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侵略据点，码头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工具。旧社会的码头工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遭受到极其残酷的剥削和迫害，同阶级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长期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上海港码头工人在解放前所遭受的剥削和迫害是旧中国广大工人的普遍遭遇，他们的英勇斗争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

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一系列斗争，把原来被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霸占下的码头，逐步收归人民所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消灭了码头上的剥削制度。码头工人当家做主，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上海港码头的面貌，彻底粉碎了阶级敌人污蔑码头工人“管不好码头”的无耻谰言。

但是，码头上的每一步变革，每一个胜利，都不是轻易取得的，而是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解放以来，广大码头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作出了贡献。

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上海港码头工人怎样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前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以及解放后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并且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历史资料，反映上海港码头发生的巨大变化。本书写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为止。解放前的部分作为全书的第一篇，解放后到大跃进作为第二篇。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码头工人和全市工人一道，奋起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猛烈涤荡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使社会主义的上海港更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码头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并且密切联系实际，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抓大事，促大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码头上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将继续搜集、整理，编为本书的第三篇。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单位和码头工人的很多帮助，但限于编者水平，对码头上的巨大变革，还不能作出全面、确切的反映，欢迎工农兵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编 者 1974年12月

目 录

第一 篇

第一章 百年侵略帐	1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1
二、帝国主义分霸码头	4
三、倾销和掠夺的通道	8
四、军事入侵的桥头堡	12
第二章 残酷剥削史	16
一、一群吸血鬼	16
二、敲骨吸髓的压榨	23
三、血腥的反动统治	28
第三章 饥寒交迫的奴隶	35
一、码头工人队伍的形成	35
二、血迹斑斑的工票	38
三、累断筋骨的劳动	41
四、“过山跳”和“螺丝跳”	47
五、悲惨的生活	52
第四章 不屈不挠的斗争	58
一、早期的风暴	58
二、五四运动中的斗争	62
三、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64

四、参加三次武装起义	67
五、熊熊的抗日烈火	69
六、战斗到天明	74

第二篇

第五章 百年码头获新生	79
一、宜将剩勇追穷寇	79
二、扬眉吐气斗把头	84
三、码头企业的改造	89
四、毛主席、共产党恩比天高	96
第六章 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	104
一、码头盛开跃进花	104
二、卑贱者最聪明	111
三、翻天覆地的变化	116

第一篇

第一章 百年侵略帐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上海港是我国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上海港的码头工人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最早形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中，上海港遭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海港码头的发展史，也就是码头上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码头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远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那时的上海港已经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国内贸易重镇，航运和贸易相当繁盛，县城东门外的黄浦江边经常停泊大批行驶于沿海和沿江的民船，帆樯林立，密如梳齿；邻近县城的江岸，已经有了不少供民船停靠装卸使用的旧式帆船码头和堆存货物用的仓库。当时的清政府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港进行，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其他口岸，那时的上海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直接的贸易联系。但是上海港口的繁荣及其地位的重要却早已名传海外，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阴谋攫取的主要目标。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侵略者先后派遣特务分

子郭士力、林赛、麦都士等人多次到上海港进行窥探，策划武装入侵。

鸦片战争发生后，英国侵略军侵犯我国沿海各地，一八四二年六月攻陷吴淞，强占上海，又沿长江而上，进犯南京。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仓惶投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款中包括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五个沿海港口为对外通商口岸。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也紧跟着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攫夺了同样的特权。从此，上海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分霸割据下，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港口，上海港的码头也沦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十九世纪上半期，轮船还未普遍使用，在远洋航行中仍然是使用依靠风力的帆船。上海港对外开放后，最初来到港口的外国船舶也是一些洋式帆船，载来的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运走的是蚕丝、茶叶和白银。这些外国帆船吃水较深，不能停靠江边的民船码头，进港后都是停泊在黄浦江心，货物装卸必须用小船驳运。所以当时外国侵略者便在外滩一带靠近外国洋行所在地的黄浦江边，建造了一些砖石结构的驳船码头，专供驳船停靠和装卸货物之用。到了一八六〇年以后，沿海和沿江航运开始使用轮船，一些经营航运业的外国洋行也开始在黄浦江边造起轮船码头。到了一八七〇年前后，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向外扩张，同时远洋航行中轮船逐步取代了帆船，外国轮船大举侵入我国沿海和沿江航线，加紧了对我国广大内地的倾销和掠夺，上海港的轮船航运迅速增长起来。这时，黄浦江边的轮船码头也越造越多，外国侵略者开始了瓜分上海港的争夺，他们争先恐后地在黄浦江两岸强占土地岸线，陆续造起了许多轮船码

头和仓库，为他们的侵略活动服务。侵略者建造码头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迫害的过程。他们在建造码头时，强夺民地，霸占岸线，填堵水域，犯下了许多罪行。例如英帝公和祥码头公司顺泰码头的所在地，原来叫作瞿家滩，住着几户渔民。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老板看上了这块土地，想要夺去作为建造码头的地基，便强迫渔民迁让，但遭到了渔民的拒绝。帝国主义分子就勾结串通了当地的地主豪绅，逼走渔民，霸占土地，造起了码头。二十世纪初期，浦东白莲泾口建造大来码头时，美帝大来洋行指使地痞流氓高大年、贾胜发等压低地价，强买农田，逼得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同时还强行圈断公路，阻绝交通，封闭黄浦江上八大渡口之一的姜家渡，甚至填没了白莲泾河床的五分之一，作为大来码头的地基。白莲泾港是上海、川沙、南汇三县的交通要道，来往聚散的船只很多，河床被填堵后，河身变狭，水流加急，妨碍民船航行，影响三县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英帝公和祥码头公司扩建浦东其昌栈码头时，也是利用当地流氓，强买民产。有一个姓刘的农民坚决不卖，公和祥的洋大班格兰特就使出毒计，把刘家土地圈入码头围墙之内，并指使码头门警百般刁难刘家的出入，又把煤渣垃圾堆在刘家土地周围，这样，经过几次下雨，一块良田就变成了水塘。结果把姓刘的农民活活逼死，霸占了这块土地。

上海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土地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公和祥码头公司在扩建其昌栈码头时，曾经企图侵占一所渔民的房屋。这家渔民姓张，弟兄四人，打鱼为生。当时公和祥码头公司派人去找张家弟兄，要强行收买这所房屋，但张家弟兄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顶住了外国侵略者的威胁，坚决不

卖。帝国主义分子见威胁不行，又转而利诱，表示愿出重价，张家弟兄蔑视地回答：“即使一片瓦给一两金子，也决不出卖。”结果侵略者霸占土地的阴谋未能得逞。公和祥码头公司在修建围墙时，不得不让开这所房屋，而成了一条凹形围墙。这堵墙一直遗留到解放后，成为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历史见证。

到了抗日战争前夕，沿着黄浦江两岸，自吴淞口直到日晖港上游的鳗鲤嘴，绵延约四十公里，都遍布着帝国主义的码头。那时，上海港全部码头中，属于帝国主义各国所有的就占码头总长度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仓库总面积中，占据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二。

二、帝国主义分霸码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港，帝国主义列强几乎霸占了港口全部深水地段的码头，浦江两岸挂满了五花八门的外国旗，大好港口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幅缩影。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帝国主义分霸上海港码头也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的，他们以资本和实力为后盾，在黄浦江两岸各占地盘，称王称霸，既有争夺，又有勾结，而勾结又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并且随着资本和实力的变动，不断进行新的分割。二十世纪初期，分霸上海港码头的有英、美、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那时有一首顺口溜说：

浦东到浦西，

老英、花旗、法兰西；
日本鬼子不落伍，
霸占虹口、杨树浦。

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分霸上海港码头的情况。

英帝国主义是最先进入上海港的侵略者，盘踞时间最长，霸占地盘也最大，在旧上海港长期充当着第一号霸主的角色。

英帝码头中规模最大的是公和祥码头公司，这个码头公司是属于英帝资本怡和洋行系统的一个分支机构。怡和洋行本是最早侵入中国的鸦片贩子之一，早期通过贩卖鸦片、军火，掠夺白银、丝、茶，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了大量资本。以后又把魔爪伸向各个方面，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据有顺泰、琼记和滔律文等几座码头。一八七五年又收买了原复升洋行的公和祥码头，连同它原有的几座码头，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专门经营码头业务的公和祥码头公司；以后又陆续吞并了浦东、浦西的其他几座码头，霸占了沿江大量土地和岸线，成了旧上海港最大的码头公司。这个公司是英帝国主义用来垄断、控制旧上海港的码头业务，以便它把持航运、装卸，进行倾销、掠夺的重要工具。

英帝资本码头业中还有一个太古洋行，原来也是个老牌鸦片贩子，很早就侵入上海港，在黄浦江边建造码头，后来又投资轮船航运部门，与其他各家洋行争夺我国沿海及长江航运的利益。太古洋行在浦西新开河附近据有太古码头，在浦东据有华通码头和浦东栈码头。此外，太古洋行还经理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码头的业务。因而太古洋行当时在上海港也拥有大量码头，势力仅次于公和祥，是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港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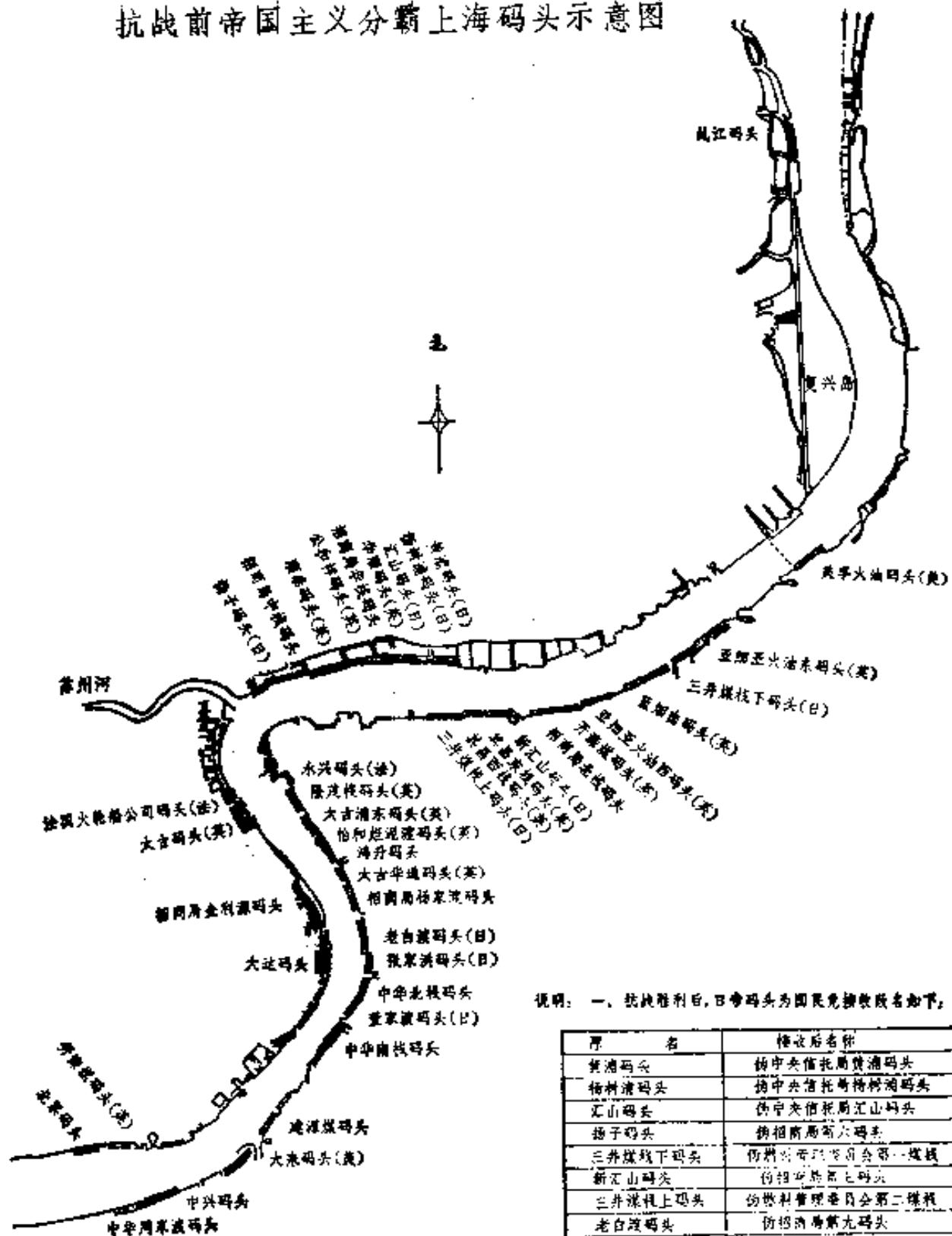
业中又一重要据点。除此以外，属于英帝资本的还有隆茂栈及亚细亚火油公司码头等处。

最早和英帝国主义争霸的是美国侵略者，在早期的鸦片贩子中就有不少美国佬。其中有一家其昌洋行，也是以贩卖鸦片起家的，在捞到了大量不义之财以后，看到轮船航运一本万利，大有横财可发，于是又从事轮船投机，和英帝国主义争相掠夺我国沿海及长江的航运利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这家洋行拥有十余艘轮船和上海港内的六座码头。一八七七年，“其昌”股东散伙，把它的轮船和码头以高价卖给了清政府“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帝国主义势力再度插手上海港的码头业，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一九一七年，美帝资本大来轮船公司为了扩展对中国的航运业务，在浦东白莲泾霸占土地，建造大来码头，成立大来码头公司，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港的主要基地。一九二九年，大来轮船公司改组为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大来码头公司也于同年归并为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直属机构，专门为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航运利益，并从事其他侵略活动的罪恶目的而服务。此外，属于美帝资本的还有浦东的美孚、德士古等油码头，这些码头是美帝向我国倾销石油的工具。

法帝国主义在上海港对外开放初期，就在“法租界”外滩建有法国火轮船公司码头，以后在浦东又有一处永兴洋行码头，但法帝国主义在上海港的资本和实力比不上英、美，在全港码头中分割的比重也不大，远不如英、美、日三国。

德帝国主义入侵我国航运事业也是很早的，一度也曾参与对上海港码头的分割。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张家浜码头公司和一九〇一年成立的扬子码头仓库公司都是德帝资本。但第

抗战前帝国主义分霸上海码头示意图



说明：一、抗战胜利后，日商码头为国民党接收改名如下：

原 名	接收后名称
黄浦码头	伪中央信托局黄浦码头
杨树浦码头	伪中央信托局杨树浦码头
汇山码头	伪中央信托局汇山码头
扬子码头	伪招商局扬子码头
三井煤栈下码头	伪裕兴公司第一煤栈
新汇山码头	伪裕兴公司七码头
三井煤栈上码头	伪裕利管理委员会第二煤栈
老白渡码头	伪招商局第九码头
张家浜码头	伪招商局第八码头
董家渡码头	伪裕新管理委员会第三煤栈

二 代表码头

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帝战败，失去了资本和实力，也就失去了原先在上海港侵占的地盘。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上海港的时期虽然较晚，但扩张得却很快。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以后，日帝攫取了在我国内河的航行权，就竭力在上海港夺取地盘，抢占土地岸线，扩展自己的势力。大阪商船会社于一八九八年始侵入我国航运业，在杨树浦建有大阪码头。一九〇三年，日本邮船会社收买了杨树浦原英商麦边公司的码头，改称为汇山码头，此外，它又先后据有虹口码头和浦东的新汇山码头。一九〇七年，日本几家轮船公司为了提高同英、美资本的竞争能力，加紧对我国航运利益的侵夺，合组了日清汽船会社，主要经营沿海及长江内河航运，在浦东老白渡建造了日清码头。另外，属于日帝资本的还有大连汽船会社的黄浦码头和日本邮船会社的三井、菱华等码头，分布在杨树浦和浦东沿江一带。日帝资本的码头总数不少，称霸野心极大，与英、美资本力争霸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吞并了英、美资本的码头，形成了日帝独霸港口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势力卷土重来，恢复各自的地盘，美国军舰充塞上海港内，到处占用码头。国民党反动派跟在美帝国主义之后，抢夺胜利果实，大批日帝码头，转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有。

解放前的一百余年中，帝国主义分霸上海港码头，干尽了种种坏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三、倾销和掠夺的通道

上海港被迫对外开放后，海盗式的外国商人蜂拥而至，港

口吞吐量迅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原来的对外贸易中心广州港而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上海港的对外贸易数量，就一直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一半左右。但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下，旧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不平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上海既然是一个最主要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也就更加凶残。它们在上海强占大片土地，建立了最大的租界，夺取了中国的海关主权和港口管理主权，垄断了交通航运，霸占了大批码头仓库，从而把上海港变成了它们对中国进行倾销和掠夺的主要通道。

鸦片是早期帝国主义的主要倾销商品。上海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初期，来到上海的外国船没有不装载鸦片的，吴淞口外经常停泊着许多鸦片趸船，作为接运和储存鸦片的水上仓库。上海港的鸦片输入量逐年增长，到了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间，每年输入上海港的鸦片已达五、六万箱之多，占全国鸦片输入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上海港进口洋货总额中，鸦片也占着极大的比重，从一八四七到一八五〇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价值一千二百多万元，占进口洋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一八七〇年以后，由于进口工业品的大量增加，鸦片的比重虽有下降，但仍占进口洋货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占进口洋货的六分之一，其

绝对数量仍然很大。那时英帝公和祥码头公司还设有专门储存鸦片的仓库，可见这些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输入规模之大。外国侵略者利用码头仓库作为他们大规模贩毒的工具，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紧跟着鸦片之后，各种工业品的倾销也迅速增长。上海港对外开放不久，就成了外国工业品倾销的主要口岸。这些进口工业品又通过上海码头转运内地，深入城乡，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使大批劳动人民失去生计，更加贫困。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也在进口货倾销的压抑下，不能顺利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倾销，沿着黄浦江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仓库都堆满了美国货，包括各种各样的所谓“剩余物资”、“救济物资”以及形形色色的走私商品。一九四六年，仅是报关进口的美国货即达三亿多美元，此外，大量不向海关报税、走私进口的货物，还不计在内。这些美国倾销物资，从豪华的汽车、玻璃丝袜、胭脂口红、香烟草纸，直到霉烂变质的奶粉、面粉、罐头等等，无所不有，象潮水一样涌入，充斥市场，泛滥成灾，逼垮了本来就已经十分虚弱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大批产业工人的失业。资本家又千方百计把美货倾销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借口营业不好，不发工资，使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那时候码头上堆积的洋货越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困难，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越重。

解放前的上海港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进口港，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出口港。帝国主义通过不等价贸易，以高价倾销工业品，以低价掠夺我国的农副产品，从中攫取暴利。早期从上海港出口的物资以蚕丝和茶叶为主，特别是蚕丝，更是以上海港为主要的出口港。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魔掌越来越深入

中国农村，各种农副产品被掠夺运输出口的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一贯压价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的价格被压得低而又低，这就更加加深了中国广大劳动农民的贫困。如生牛皮出口价格极为低廉，运往国外加工后，再输入中国，价格就增加几十倍，一张出口生牛皮竟换不到由进口皮革做成的一副鞋底。这种不等价的贸易是对中国农民的残酷剥削，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掠夺的需要。因此，那时候从上海港码头装上外国轮船的出口农副产品越多，农民所受的剥削就越深重，生活也就更加困苦。

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和低价掠夺的结果，必然造成上海港的巨额入超。解放前，上海港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入超港。十九世纪下半期，我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一港；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展，其他各通商口岸的入超额也迅速增加。这时，上海港的入超额在绝对数继续增长的同时，仍经常占全国入超总额的一半以上。如以抗日战争前入超额较多的几年为例，一九三一年上海港入超额为五亿五千多万元，占全国入超额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八；一九三二年上海港入超额为五亿四千多万元，占全国入超额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九三三年上海港入超额四亿二千多万元，占全国入超额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三。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大量涌进上海港，入超激增。一九四六年，全国入超额为伪法币一万零九百亿元，而上海港入超额就有伪法币一万零二百多亿元，占全国入超额的百分之九十四。巨额的入超都是要用金、银和外汇弥补的。解放前的上海港又是全国最大的金、银出口港，特别是黄金的主要出口港。十九世纪末期，黄金出口数量不断增长，一八八六年上

海港出口黄金，折合白银一百七十四万六千多关两^①，一八九四年便激增为一千二百七十万八千关两。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港仍然是黄金、白银的主要出口港。一九三二年我国出口黄金价值二千三百多万美元，都从上海港输出，而且全部运往美国；一九三三年出口黄金价值一千四百多万美元，也是从上海港出口的，分别运往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九三四年，中国白银大量流往美国，全国输出的白银共值银元二亿六千七百多万元，其中就有二亿三千多万元是从上海港出口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港码头运往帝国主义的老巢。因此，解放前上海港的码头，就象是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血管，无休止地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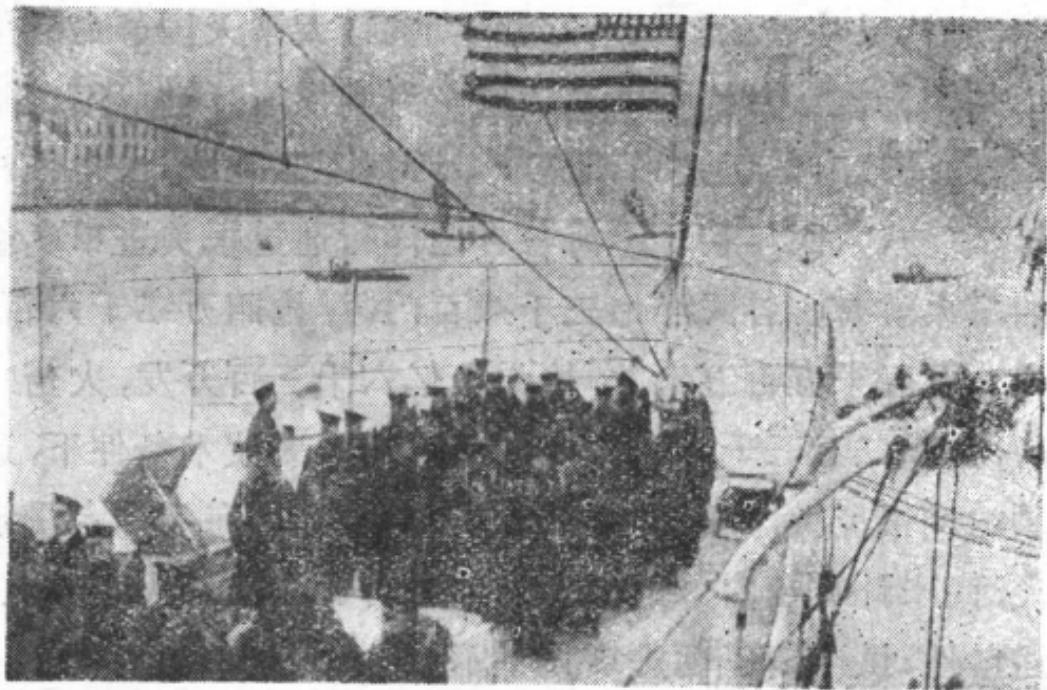
四、军事入侵的桥头堡

旧上海的码头不仅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而且被他们用来作为军事入侵的桥头堡。自从上海港对外开放以后，黄浦江里就经常停满了外国军舰，每逢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进入高潮时，大批外国侵略军就从码头登陆，进行武装镇压。早在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和水兵就公然配合清军，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一八七四年，上海人民为了反对扩张“法租界”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当时法、美两国的水兵就在外滩登陆，枪杀人民。一八九七年，上海小车（独轮木车）工人为反对“租界”当

① 关两是旧海关用的计算单位。一关两折合银元1.50元。

局加征捐税而发动罢工，在外滩同“租界”的巡捕和马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把外国巡捕打得人仰马翻。这时，停泊在黄浦江心的外国军舰就放炮威吓，外国水兵也立即武装登陆，进行镇压。以后每次发生群众反帝运动时，外滩码头经常有外国水兵登陆，残杀中国人民。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逼近上海，帝国主义殖民当局慌忙调来了大批军舰和军队，准备镇压中国革命，并配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上海工人。当时集中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军共有二万多名，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竟达数十艘之多。

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的两次侵华战争，大批军队和武器弹药，正是从上海港一些码头起卸登陆的。那时的汇山码头、杨树浦码头和黄浦码头完全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军用码头。如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运来了十万侵略军和大批的飞机、大炮，



解放前横行黄浦江上的帝国主义军舰

在虹口沿岸码头起卸后立即运往附近日军阵地，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破坏中国人民的财产。在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战争中，这种军事运输的规模更大，甚至日帝自己的几个码头不够使用，又向英帝公和祥码头公司租借虹口和顺泰两处码头仓库，供日本侵略军起卸和储存军火武器之用。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立即开进了黄浦江，上海港内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美国军舰，许多重要码头都被美国侵略军强行征用，靠泊船舰，装卸武器和各种军用物资，沿江仓库里堆满着专供屠杀中国人民之用的武器弹药。一九四六年，美国侵略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汇山码头，外滩一带到处挂着美国旗，拥塞着美国兵，上海港又从日本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国的“占领地”。

“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解放前，帝国主义一贯利用上海港为中国的反动派输送军火，转运军队，支持反动政权。一八六〇年前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港供应反动清军大量军火，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据不完全统计，自一八五九年到一八六四年初，上海各外国洋行通过报关进口卖给清军的军火就有：各式洋炮三千八百门，洋枪四万二千六百支，炮弹一万五千五百五十发，枪弹一亿六千三百万发，火药一百万磅，硝磺二万三千六百石。在当时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这些数量已经很惊人，实际上还有许多没有经过海关的大量走私军火，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军火都在沿黄浦江码头起卸上岸，转运各地，供应清王朝进攻太平军，屠杀人民。

一八六一年冬，当太平军部队逼近上海时，上海地区的

清军，兵力空虚，惊惶万状，便勾结英帝国主义调集了停泊在长江里的全部英国轮船，把反动头子曾国藩、李鸿章部下的清军八千多人从安庆抢运到上海，登岸防守，负隅顽抗。

解放前，在镇压人民革命的问题上，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总是密切勾结，穿着连裆裤子的。他们一贯利用上海港作为最大的军火转运站。帝国主义通过上海港码头供应反动派的军火不计其数，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反动派，都通过上海港取得了帝国主义供应的大量军火，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的资本。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互相勾结，以上海港作为中转基地，用美国军舰和船只为蒋帮抢运大批军队和武器，赶赴内战前线，进攻解放区。同时，美帝又从海外运来大量军火，供给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上海港就是美帝援蒋军火的主要卸货地点。一九四八年末，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面临土崩瓦解的局势，美帝国主义急忙派遣五艘载重五千吨以上的军舰，向上海赶运武器弹药，妄图支持反动军队进行垂死挣扎。仅仅在这年十一月份一个月内，经由上海美军司令部之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器弹药价值就达到六千六百四十万美元。这还仅仅是美蒋反动派利用上海港码头抢运军火屠杀中国人民的许多罪行中的一个。

从上海港被迫对外开放，直到解放的一百零七年中，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控制下的上海港码头，主要就是被用来进行上述这些罪恶勾当。当时的码头，就象是套在黄浦江上的枷锁一样，锁住了中国的经济动脉，掐紧了中国人民的咽喉。

第二章 残酷剥削史

一、一群吸血鬼

解放前的码头，不仅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群吸血鬼对码头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手段。旧上海的码头业是人所共知的“黑门”。洋老板、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这样一群吸血鬼，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

码头上最大的剥削者，就是吸饱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洋老板，是随同帝国主义炮舰一起来到中国的一帮流氓、海盗和“冒险家”。他们依仗着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特权和垄断财团的势力，勾结中国的反动派，垄断了旧上海的码头业务，横行霸道，残酷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码头上的洋老板几乎无一不是从两手空空的“冒险家”变成了家财万贯的富翁。从公和祥码头公司的帐面数字来看，自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三〇年，平均每年利润额达到七十万两银子左右，约折合九十万银元；自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〇年，平均每年利润额达到伪法币一百三十六万多元，总计约三千六百多万元，而这还只是根据帐面上的记载，帐外的数字还未包括在内。公和祥码头公司成立于一八七五年，直到一九五三年停业，共计七十八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它剥削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就可想而知了。

再如美帝的大来码头，虽然规模比不上公和祥，但是剥削的手段却毫不逊色。大来码头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军占领，战后复业。它同样残酷地压榨码头工人的血汗，在其经营的时期内，大发横财。从帐面上看，仅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止，短短的六个月中，获得净利伪法币十亿元以上，按当时外汇牌价折合四十四万七千多美元。大来码头美国大班杰勃生在一九四八年供认，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两三年内，大来码头就赚了二百五十万美元。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开设的企业为了剥削的便利，都雇有买办，帮同进行各项剥削活动。所谓买办，就是洋老板的代理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忠实



吸饱鲜血的洋老板

走狗，死心塌地为外国主子服务，千方百计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并从中分沾残羹，喂肥自己。买办向外国老板卖身投靠时，通常订有“合同”，其中规定：买办必须向外国老板效忠，为洋行谋取利益；同时，外国老板也付给买办一定的薪金，并允许买办抽取一部分工人的力资。实际上，薪金不是买办的主要收入，买办主要的剥削来源是克扣工人的工资。

买办为了进行剥削，通常在洋行中另外设立买办帐房，又称华帐房，下设二买办、三买办，作为他的帮手；此外，还雇用各种办事人员，他们绝大部分是一些工资低微的职工，也是买办剥削的对象。

买办的职位可以世袭，也可以在家族亲友之间，互相转让。有时外国老板也因要选择更得力的奴才而另雇买办。如公和祥码头公司的买办甘翰臣从一八七五年当上公和祥的买办，一直干了五十年，传位给他的儿子甘炽先，到了抗战胜利后，由于原怡和打包厂买办顾乾麟对洋主子侍候得更为周到，外国老板就改雇顾乾麟当了公和祥的买办。

买办一方面为洋主子效劳，帮助帝国主义分子对码头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又与封建势力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通常兼任大包工头，直接向洋老板包揽码头上的装卸业务，或者转包给别人，从中抽利；或者自己设立扛力帐房，找几个二包头，坐享分成之利。如大来码头、黄浦码头、汇山码头、华顺码头等买办都是兼任大包工头进行双重剥削，手段十分毒辣。大来码头买办兼包工头贾柏馨，从一九四六年初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底的十八个月内，肩不动，膀不摇，剥削收入折合白米二百八十多斤，平均每天净收入白米五千二百斤。一天的剥削收入就足够供一个码头工人吃十四年。

官僚资本也在上海港占有若干码头。解放前，上海港官僚资本码头，约占全港码头的百分之十四，其中主要是招商局所属的几座码头。招商局成立于一八七三年，是反动官僚把持下的航运企业，历经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几个时期，前后经营共七十多年，除了为历届反动政权调兵运饷，镇压人民外，又是反动官僚借以搜括民脂民膏的机构。抗日战争前，招商局在上海港内共有北栈、南栈、中栈、华栈、新栈等五处码头，专门停靠招商局轮船。这些码头名为中国所有，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它不但任用外国人主管码头事务，而且还一再被反动派作为向外国银行借款的抵押品，完全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每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时，招商局又总是投靠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门下，乞求“保护”，恬不知耻地换上外国招牌，扯起外国国旗，因此，它的几座码头多次变换旗号，简直弄不清是谁家财产。

抗日战争时期，招商局码头先是挂上美商招牌，以求“保护”，后来仍然为日帝占据。抗战胜利后，招商局除了收回了原来被日帝占据的码头，又接收了一批日帝资本码头，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胜利果实化为四大家族的私产。招商局的码头也从原来的五处增加为九处，专门设立了栈埠处加以管理。

在反动官僚把持下，招商局一向管理腐败，弊端丛生，成了大小官僚贪污中饱，恣意吮吸人民血汗的场所。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美货倾销，大量涌进港口；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招商局承担了军运的主要任务，码头上装卸繁忙，这是吸血鬼们加紧榨取码头工人血汗的机会，招商局各码头利润逐年增加。根据帐册所载，一九四六年招商局各码头净利

共达六十三亿八千五百多万元伪币；一九四七年净利更高达一千零九十四亿多元伪币。实际上，官僚资本机构中的大小官僚分子一向是层层中饱，贪污分肥，所以实际的利润额远远超过此数。

码头上的吸血鬼中，除了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外，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解放前，民族资本的码头仓库业仅占全港码头总长度的百分之十五，仓库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二，而且大多数设备简陋，规模很小，只能做一些洋老板不屑做的零星生意，或是停靠一些华商轮船。尽管如此，码头业资本家的剥削手段和程度并不比洋老板差。

以中华码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原名义泰兴码头公司，在浦东共有义泰兴南栈、北栈和周家渡三处码头，一九二七年改组为中华码头公司，是民族资本中最大的码头企业。

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港的势力很大，“洋栈单”吃得开，而华商码头要兜揽生意又必须找洋人的“船头行”（轮船公司的代理商），义泰兴码头公司也就要想办法挂上外国旗。资本家便出钱找英帝的壳件洋行做代理人，又以高价雇佣外国人来管理码头，还请了浦东大流氓张阿六、贾福田当码头的“顾问”，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工人，以加强其剥削。

义泰兴码头平时挂着外国旗，靠着洋人的势力，妄想托庇帝国主义的“保护”，但是当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高涨时，资本家便又立即扯下外国旗，换上了中国旗。例如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发动总罢工，码头工人也都拒绝在外资码头装卸货物。资本家便急忙将两面中国旗送到码头上挂起，同时却又利用外资码头工人罢工的机会，暗

中委托洋人向各外资轮船公司招揽营业，拉拢外国轮船停靠义泰兴码头。更可恨的是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竟然违犯罢工工人的禁令，在英、日、美帝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之时，秘密供应外资工厂的用煤，并允许日本煤轮“淀丸”停靠码头，又召来大批反动警察和军队，用武力强迫工人装卸外货。这种卑劣的阴谋活动，立即遭到了工人们的揭露和谴责。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抢运美帝“剩余物资”，上海港的航运事业一度“繁荣”起来了，码头仓库业也跟着大为“兴旺”。中华码头公司的资本家收回码头之后，就利用残存的破烂设备，恢复了营业。那时候，码头上都堆满了美国货，业务十分繁忙，经常要加夜班，资本家借口加班，向客户大收加班力资，半夜工照定价加百分之五十，全夜工要加一倍。资本家就在这种加班力资中进一步剥削工人。

巧取豪夺的结果，中华码头公司每年也攫取了大量利润。早期的不说，仅从抗战胜利后两三年内的帐面上看，一九四五年末的三个月所获净利就达伪法币三百四十八万元；一九四六年是五亿多元；一九四七年更高达二十六亿元；一九四八年为伪金圆券三十五万九千多元，如果换算成伪法币，就要达到十几万亿元之多。中华码头公司的资本家同样也把剥削所得的钱随时套购外汇，换成了美元。到解放前夕为止，中华码头公司积存的美元共有五十万元之多。此外，在这几年内又修建了六所仓库，一座码头，两处房产，以及货棚等，加在一起，也要值到五、六十万美元。这就是说，中华码头公司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开始复业，两三年时间内，就从码头工人身上剥削了一百多万元。

码头上的洋老板、买办和中国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极端

残酷，但又十分狡猾地不和工人发生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利用封建把头来实行对工人的统治和管理。封建把头包揽了码头上的装卸业务，所以又称包工头。他们依仗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在码头上横行霸道，干尽坏事。当码头上有轮船停靠，需要工人装卸货物时，包工头就根据货量的多少，临时召集一定数量的工人装卸，等到货物装卸完毕，就把工人赶出码头。码头工人工作毫无保障。

包工头的剥削又分成许多层次。大包工头通常把持着一个码头或几个码头，在大包工头之下，还有许多二包头，他们把码头再分割成许多部分，各霸一方，和大包头拆帐分赃。当时，码头上的装卸工作，分成杠棒、肩运、堆装、翻仓、转栈、过驳等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这种分工并不都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而是包工头们把持分霸的结果。如太古码头的进出口货物，就要经过七道手续，换六次工人；招商局金利源码头在大包工头之下又分杠棒、肩运、南北洋出口、长江出口、鲜货现提等几个部分，各有二包头分管，相互不能侵犯。在二包头之下，有的还有三包头，有的有一批小头脑，又叫小领班。层次有多有少，各个码头并不完全相同，按照码头上的封建把持关系而定。

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有明有暗，花样很多，主要的就是拆帐。大包工头从码头公司或买办手里领得的力资中首先要扣除绝大部分，余下的再通过二包、三包等层层扣除，最后分给工人时，只剩下了一点零头。工人们愤怒地说：“把头，把头，吃人不吐骨头。”在这样的剥削制度下，包工头也个个都成了大小财主。在抗战以前，开滦码头的两个大包工头张锡华和韦成记，当时都是拥有一两百万家财的百万富翁。抗战胜利

后，招商局金利源码头大包工头鲍朝云，承包码头不久，就连续开了三家煤球厂，造起了三幢三层楼的洋房。

二、敲骨吸髓的压榨

码头上吸血鬼们的剥削收入有上下力资、栈租、靠泊费等项，而上下力资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通常占码头公司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上下力资是货主支付搬运货物的费用。货物经由码头装卸，都由工人搬运，从码头装上轮船叫作上力，从轮船卸到码头叫作下力。码头公司向货主收取力资后，从中扣除一大部分，作为码头公司的收入。在帝国主义资本的码头业中，扣除力资的比重一般是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如公和祥码头公司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十五年中，平均每年上下力资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六二都被洋老板吞没了。而且，这一比例是逐年提高的，从一九〇六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零三增高到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七七，一九四〇年又增高到百分之八十三点四七。

这个克扣比例，各个码头大体上相差不多。上下力资经码头公司克扣后，还要经过买办、包工头第二道、第三道等的克扣。每经过一道克扣，就要剥削掉余额中的大部分，结果，几乎全部的上下力资都被大大小小的吸血鬼们剥削去了，只剩下一点零头付给工人。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解放前码头上重重剥削的残酷情况。

一九三七年，有一次日帝黄浦码头装卸一批烟叶筒，搬运的时候需要两个工人滚一筒，每筒收取力资三元七角，东洋老

板坐拿三元三角二分，占全部力资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七，剩下三角八分发给买办，买办又从中剥削二角三分，余下一角五分，发给包工头，包工头每筒再扣七分，两个工人只能拿到八分钱，仅占全部力资的百分之二点一八。又如生铁的上下力资，每吨二元零二分，东洋老板拿去一元五角二分，余下五角，发给买办，买办从中克扣三角，余下二角，包工头再克扣一角四分，工人到手只有六分钱，仅占全部力资的百分之三。又如杂货装卸，每件力资一角四分，东洋老板发给买办二分八厘，再经过买办、包工头的层层克扣，能落到工人手里的只有八厘，连一分钱都不到。一九三七年七月，黄浦码头停靠一艘轮船“新宁汀考脱”号，载来钢材九千二百七十英吨（约合一万零九十吨），共卸货十二天，每天二百七十五个工人做工，总计三千三百工。码头公司收力资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八元二角二分，加上外档现提等费，共收二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元五角六分，东洋老板扣下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三元八角一分，发给买办六千零三十二元七角五分，买办又从中扣除二千七百一十二元七角五分，再加上买办和包工头向客户索取的额外贴力每英吨二角，买办从中分百分之四十，合计共收入三千四百五十四元四角。余下力资三千三百二十元还要经过大小包工头的剥削，贴力的百分之六十也全归他们所得，最后落到工人手里的一共只有一千九百十一元，按三千三百个工分摊，每个工人每天所得只有五角八分。这个数目和洋老板、买办及包工头等的剥削收入相比，简直连零头都不到，况且工人们还不是每天都能有工做的。

克扣上下力资仅是码头资本家、买办、包工头剥削活动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剥削收入。轮船靠泊码

头，要收靠泊费，货物存放仓库，要收栈租，这些都全归码头资本家收入。

买办的其他收入也有好几种名目。所谓“贴力”，就是买办在码头公司规定的货物装卸费率之外，向货主多收的部分，这是买办额外收入的一种。买办利用接近洋人，自己又兼着大包工头的特殊条件，经常假借工人名义向货主勒索贴力。实际上这些贴力都归买办和大小包工头瓜分，工人丝毫无份。例如黄浦码头收取的贴力，买办独得四成，大小包工头分得三成，余下三成为三十股，其中买办家属（大小老婆等）占十二股，小买办（买办的儿子）二股，二买办二股，三买办一股，其他十三股由公司帐房、杠棒帐房、档手、跑码头等人分摊，这样，贴力的一半以上落入了买办的腰包。

包仓库是买办的又一收入。外商码头的仓库通常包给买办管理，洋老板按议定的数额付款给买办，由买办雇佣职工管理仓库，从中进行剥削。例如抗日战争前，公和祥买办甘翰臣向英国老板包下仓库管理。一座三层楼的仓库，管理费每月金额二百九十四元，实际上甘翰臣只雇佣三个职员和一个学徒管理一座仓库的全部事务，平均工资每人约十元，只需付出四十元工资，剥削率非常高。而买办包下的仓库，少则几座，多则十几座，每月仅仅从承包仓库管理上就要剥削一笔巨大的款项。

除了克扣力资、贴力、职工工资以外，买办的剥削来源还有堆装费、理货费、夜工费、夜工饭贴、行李费等等。而且还要在仓库中弄虚作假，偷窃盗卖，大秤进，小秤出，进栈一千，只报八百，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公和祥买办甘炽先，每天供给码头上管理人员吃的饭，从来不必花钱买米和煤，全部从客户

存货中取用。

包工头对工人的额外勒索更是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如招商局金利源码头大包工头收到力资后，先要提出二成作为包工头交际的“开支”，其余八成中再克扣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这样已经去了大半，而剩下的一小半还要再经过二包、三包的克扣。此外，如中华码头大包头按各种不同货物，克扣力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大达码头包工头除公开扣除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外，还要克扣百分之十作为“福利金”，实际上这种所谓“福利金”也是剥削的名目，工人们是根本没有什“福利”的。甚至在工人们分摊剩余的力资零头时，包工头还不肯放过，又要再刮去一笔。如公和祥码头肩运包工头宋玉书，一人就要算上三份半（本人一份，老婆一份，儿子一份，他家养的一条狗也要摊上半份）。那时每天进出栈约有十八班，每班三份半，一天就要摊上六十三份。太古码头包工头周瑞生也是这样，他家里的老婆、孩子、佣人、打手、猫、狗都要按份拆帐。公和祥码头杠棒包工头张志发，自己家里所用的水电费全都分摊在工人的头上。其他的包工头也都普遍地吃空份，明明是十个人做的工，硬要照十二个人分摊，十五个人做的工要算二十个人，多出来的份额都是包工头的收入。

拆帐是明的克扣，另外还有暗的克扣。例如包工头往往还要瞒吨位、瞒力资，明明做了一千吨，硬说只有八百吨；收了力资一千元，告诉工人只有七百元。工人明知不对，也不许过问，谁要是问一声，包工头就把两眼一翻，破口大骂；再不然就把手枪一拍说：“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吗？”工人若是争论一下，下次就拿不到工票，做不到工，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

有的时候，包工头干脆不给工钱，强迫工人白做。招商局

金利源码头一个姓吴的包工头，逢年过节就要工人替他“义务劳动”，白做一天，一文不给，说这算是贴补他的交际费，甚至就在平时也常巧立名目，要工人为他“义务劳动”。

除了规定的力资以外，包工头还可以向货主收取酒钱和各种陋规。额外陋规的名目很多，上车有上车钱，落驳有落驳钱，天雨有天雨钱，快装有快装钱，货物在码头上过夜，要保险钱、过夜钱，还有天热钱、天冷钱等。这种陋规、酒钱的收入，数额很大，全归大小包工头分赃。

经过种种明扣暗夺，工人最后得到的一点微薄力资，包工头还不肯爽爽快快地付给，要几天一结帐，拖拖欠欠。工人本是做一天吃一天，还难以维持温饱，在解放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工人分摊的几个钱，要隔上几天才能到手，更加买不到东西了。而包工头却把拖欠工人的力资拿去囤积、放债、做投机，剥削更多的钱。工人则往往由于家里等米下锅，就不得不向包工头借高利贷，这又是包工头的一种剥削方式。如胜记公司外档头子林杏生，借给工人高利贷，每天要加四成的利钱，两天半就要翻一番，三天不还就得挨打受骂。

另外，包工头还经常向工人“打秋风”，勒索“礼金”。每当逢年过节以及包工头家里的“婚、丧、喜、庆”，工人都得送礼。这种变相的剥削，几乎每个月都有，甚至一个月内就有几次。包工头“打秋风”的名目很多：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日要做“阳寿”，家里早已死去的人也要做“阴寿”；生了孩子，又是“三朝”，又是“满月”；儿子结婚，女儿出嫁、等等，都要强迫工人出钱送礼，没有钱也得借高利贷送礼。有的包工头一年要做两次“生日”，上半年做过，下半年又要做。“四十大寿”也要连做三年，前一年“预祝”，第二年“正寿”，第三年是“阳历岁

数”。有一个包工头甚至每生一个女儿，就强迫工人预交一笔“嫁妆费”。

洋老板、买办、资本家、包工头这样一群吸血鬼的巨大财产，都是建筑在广大码头工人的血汗和痛苦之上的，沉重的层层剥削，榨尽了码头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汗，而吸血鬼们却在码头工人的血汗堆上垒起了剥削者的天堂。

三、血腥的反动统治

一小撮吸血鬼为了维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镇压工人的反抗，就必然要在码头上实行极端残酷的血腥统治，把码头变成了一座座黑暗的地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码头上恶霸成群，豺狼当道，横行不法，暗无天日，真正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它们在这里驻扎了海陆军，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巡捕房在内的殖民统治机构。码头既然是帝国主义重要的侵略据点，当然也是它们实行武装“保护”的对象。每当码头工人起来反抗，发动罢工的时候，洋老板就会立即召来帝国主义的军舰进泊附近的江面，张牙舞爪，摆出一副狰狞的面目，威胁和镇压码头工人。外国巡捕也会立即赶来码头上，任意逮捕、毒打、枪杀工人。此外，码头上的洋老板还豢养了一批看守和驻卫警，加强对码头工人的残酷统治。

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总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反动派的警察局奉行外国主子的命令，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为洋老板效劳，只要一接到洋老板的电话，就会出动大批警察来镇压、逮捕工人。

前面说过，在旧上海，不但帝国主义经营的码头是由外国吸血鬼直接统治的，就是中国资本经营的码头，也常常利用帝国主义势力来压迫工人，不惜出高薪雇佣洋人充当经理，或是请外国洋行出面代理。官僚资本招商局中栈码头就有一个美国大班凯根，对待工人十分凶暴。甚至他走路的时候，要是有工人不留心挡了他的路，就会不问情由举脚猛踢。工人对他恨之入骨。

勾结封建势力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中外资本家共同采用的手段。拿解放前的码头行业来说，无论是帝国主义资本的码头，或是中国资本的码头，都通过封建把头——包工头对码头工人实行血腥的统治。包工头全是一些蛮横残暴的流氓头子。他们依仗封建势力，结成狐群狗党，上下勾结，割据码头，各霸一方，形成许多“封建王国”。解放前，上海港大大小小的码头，都被这些流氓头子把持着，“一座山头一只虎”，各有各的地盘。把头们在自己的地盘内就是土皇帝，而且世代相传，有的是父传子，有的是师传徒。也有时候，彼此纠集党徒进行械斗，争夺地盘。各级大小把头公然“开香堂，收门徒”，扩张自己的势力，加强统治地位。如公和祥码头有一个姓于的把头，就曾在浦东一带设立了“普善堂”、“德善堂”、“普元堂”等组织，广收门徒。一般的二包、三包和小领班之类，差不多都是大包工头的徒子徒孙。此外，封建把头还在码头上发展各种流氓集团，扩大自己的势力。诸如“三十六股党”、“二十八股党”、“五虎一豹”、“九条龙”、“十三太保”、“上八魔下八怪”、“南霸天”、“北霸天”、“薄刀党”等名目

丑恶不堪的各种流氓组织和集团，到处都是。

封建把头还经常利用封建迷信来统治工人。如大达码头行李组的把头，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都要胁迫码头上一些行李工人到浦东圆通庵聚会，由把头求签拜神，问“团体”来年命运如何，乘机胡说一番“家有一主，庙有一神”的鬼话，妄图以此迷惑工人，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

另一方面，封建把头又利用乡土观念来控制工人。他们按照不同的籍贯组成了许多地域性的集团，如湖北帮、宁波帮、苏北帮等等，各立门户，分化工人之间的团结，便于把头们操纵控制。

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更有着密切的勾结。前面所说的大来码头包工头贾柏馨就有着一大串的反动官衔。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上海市“码头整理委员会”委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他又勾结日本宪兵队谷口少佐和汉奸陈亚夫等，组织“上海码头劳工互助会”，任常务理事，后来又当上了汪伪社会局的服务股长；日帝投降以后，贾柏馨和另一个包工头、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王义德勾结，在浦东白莲泾组织国民党党部，一九四六年他又着手组织“水上义警大队”，自封督导，一九四七年充任国民党社会局组织的“码头工人福利会”的主任委员，又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码头直属第五十八分部执行委员，还竞选“国大代表”。

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把头更是穿着连裆裤，完全分不开的，许多大小把头也往往都是特务分子。如南市的恶霸匪徒、包工头秦树明，最初投靠法帝国主义，勾结“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作为后台，后来投靠日帝，充当日本侵略者的情报组长；日帝投降后，又拜国民党警察局司法主任周光辉

为“老头子”，变成了“接收大员”，并且参加了蒋匪特务组织，任中统局的调查员。他恬不知耻地自称“三朝元老”，一贯在码头上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罪恶滔天。另一个在日帝占领时期当过日本宪兵队翻译官的包工头田永富，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又投靠蒋匪特务组织，充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七大队情报组长。浦东公和祥码头的把头陈胜堂，曾充当蒋匪特务组织中统局的调查员，是特务头子陆京士的部下，当过反动组织“护工队”的队长，阴险恶毒，绰号叫作“狗头军师”。浦东一个包工头仇安泰，本是江洋大盗，后来当了汪伪特务组织“七十六号特工队”突击组组长；日帝投降后投靠蒋匪帮，当上了水上稽查大队长、护工队长、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有着各种各样的特务身份。

解放前，在码头上横行霸道的就是这批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他们肆无忌惮地欺压码头工人，实行血腥的阶级迫害。码头工人仇深似海，怨重如山。那时候，“码头胜似虎狼窝，把头赛过活阎罗”，工人们挨打受骂是常事。公和祥码头的包工头张志发，平时在码头上总是手执藤条，监视着工人的行动，稍有不顺他的眼，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为了毒打工人，这个恶棍在右手上特意戴着一只一两多重的大金戒指，打在工人脸上，立即皮破肉绽，血流满面。新华码头有个把头叫吴良启，这家伙喝饱了工人的血汗，养得又肥又胖，活象一只猪。他对工人有“三打”：第一，看见他不低头打招呼的要打；第二，装卸时脚步走得慢的要打；第三，下工领工钱前又要找寻各种借口打人。特别是这第三打最毒辣，工人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天，好不容易熬到下工，眼看可以拿几个血汗钱，这时，吴良启就故意找岔子，拿着皮鞭乱打，工人被他打得跑开，他就借口工人离

开码头，这天的工资就全部进了他的腰包。金利源码头包工头朱德标，打烂了工人的屁股，还要在伤口上搽上一把盐，狠毒无比。类似张志发之流的杀人魔王，在旧码头上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阶级敌人心毒手辣，打起工人来不光是拳打脚踢，还要使用各种凶器。一般的鞭子棍子不算数，有的皮鞭里面还要包着铅条，棍子头上也要嵌上铁块，打在工人身上，不是断筋折骨，就是严重内伤。这样恶魔，依仗着反动势力，疯狂透顶，他们公开叫嚷“老子有钱，警察局里有人，打死个把工人算什么？”招商局码头警卫队长吴大头，打起工人来要叫五个爪牙帮凶，四个人按住被打工人的手脚，一个人按住头，他自己就用又厚又重的竹板乱打，把人打得快死了，就掼在马路上。

为了残酷迫害工人，解放前，几乎每一座码头都有专门关押工人的牢房。公和祥码头私设的牢房就有好几处。这些私设的牢房，都是关押和拷打工人的地方。抗战胜利后，公和祥码头又利用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积满臭水的防空洞，作为关押工人的水牢；在商丘路码头门口的小房间和水手间东头的一间房子，则是美国宪兵拷打工人的牢房。在太古码头六号仓库下面也有一个水牢，恶棍们经常把工人绑在半人多深的臭水里。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也设有好几个牢房，叫作特别间，里面备有吊打工人的绳索、刑具等。美帝大来码头除了一个公开的明牢外，还有一个秘密的暗牢。明牢就设在码头上的警察间里（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改为工人浴室），暗牢则设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解放前，常常有工人被关进码头私设的这些牢房，关进去之后，要缴“罚款”才许出来，工人没有钱，就由包工头假惺惺地作“保”，因为包工头可以在工钱里扣，不怕工

人不缴。工人遭到关押和毒打，不给吃，不给喝，又冻又饿，出来之后，还要逼他挣扎着去上工。有个工人叫丁老以，被关在私牢里饿了三天，缴了钱“保”出来，包工头逼着他立刻到码头上去扛铁板，老丁又气又饿，腿软乏力，支持不住，跌下黄浦江活活淹死。

把头的心肠狠，帝国主义分子的手更毒。公和祥码头大班英国人格兰特，每天都要到码头上巡查几次，任意迫害工人。有一次正是炎夏的中午，烈日象火似地炙人，格兰特竟把一个工人脱光了身子，推到一块被晒得滚烫的铁板上曝晒，使这个工人全身皮肤都被烫伤，当场昏倒，可是这个恶棍却站在一旁捧腹大笑。蓝烟囱码头大班英国人马利思专门驯养了一条狼狗来残害工人，他每天带着恶狗上码头巡视，看到那个工人不顺他的眼，就放狼狗咬人。

日本法西斯强盗迫害工人更加残酷，在日帝的铁蹄下，多少阶级兄弟惨遭杀害！仅在中华南栈码头，被日本侵略军用刺刀刺死的工人就有一百十九人；该栈有一个肩运小班共七十二人，其中遭活埋的就有十余人。

抗战胜利后，前门赶走狼，后门来了虎，美国强盗也和日本鬼子一样野蛮横暴，任意迫害工人。有一个姓徐的工人，抗战时，曾被日本鬼子反绑两手，丢下黄浦江，幸被工人弟兄救起，胜利后又被美国宪兵抓去关押起来，打得昏死过去。还有一个姓郑的工人，在汇山码头门口，被一个美国兵突然一拳打瞎了眼睛。象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此外，美国侵略者还以“招工”的名义，诱骗不少工人去美军基地冲绳岛搬运“剩余物资”，骗去的工人被关在铁丝网里，遭受侮辱和虐待，很少能活着回来。

解放前的码头工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挨不完的工头皮鞭，诉不完的血海深仇。滔滔的黄浦江啊！你流着多少码头工人的血泪！你埋葬了多少码头工人的尸体！你是码头工人苦难的见证人！



第三章 饥寒交迫的奴隶

一、码头工人队伍的形成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上海港码头工人的队伍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码头的建立而产生的，是我国最早形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部分。上海港码头工人深受旧社会的压迫，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斗争的烈火中成长壮大。

远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黄浦江边早已出现了专替民船装卸货物的“箩扛”和“脚夫”，他们是封建社会中的个体劳动者，在当时的封建把头“脚头”的压迫下，遭受反动封建势力的迫害和剥削。这些依靠搬运货物为生的“箩扛”和“脚夫”就是码头工人的前身。

上海港被迫对外开放后，侵略者的船只接踵而来，进出口货物的数量迅速增加，对搬运货物工人的需要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在轮船普遍使用以后，码头仓库大量兴建，码头工人的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到了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当时

的报纸上已经常常出现有关码头工人工伤、死亡以及遭受外国侵略者迫害的记载，可见这时码头工人的数量已经相当多了。

早期的码头工人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以及一部分失业船民和渔民。他们在进码头之后都有一本血泪帐，在来码头之前又各有一段辛酸史。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国农村本来就长期遭受封建地主的摧残，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又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起来，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洋货倾销和大量农副产品被掠夺运往国外，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加速了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多次勒索巨额赔款，以及大量贸易入超，沉重的负担归根结蒂都要落在农民头上，由贫苦的农民来承担。在旧社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催租逼债狠似虎狼。贫苦的农民被逼得无法生存，只得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变成劳动力的出卖者。有的来到上海，希望能够找到一线生机，但是那时的上海“十里洋场花市闹，穷人难插一只脚”，这些贫苦农民除了双手之外，一无所有，“进店无保，入厂无门”，哪里能找到职业？其中一部分只得流落在码头江边，成了洋老板、买办、资本家和包工头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对象。

封建社会中的上海，本是民船航运的中心，有“沙船之乡”的称号，依此为生的劳动人民数量很多。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劫夺了我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垄断了航运事业，排挤了原有的民船业，使得大批船民无以为生，流离失所，成为早期码头工人的又一来源。

黄浦江上通太湖，下连江海，沿江渔村毗连相望，依靠捕鱼

为生的渔民也不少。帝国主义入侵以后，外国船只横行江上，渔船遭殃，黄浦江两岸大批码头的建造，更摧毁了许多渔村，迫使渔民放下破鱼网，离开小渔船，另谋出路，有些渔民就当了码头工人。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一方面是上海港“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农村日益凋敝，上海码头工人队伍也逐渐扩大起来。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上海码头工人的数量约已在二万人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码头工人队伍迅速扩大，据一九二五年报纸记载，约在五万人左右。这时，失业工人成了码头工人队伍的重要补充来源。根据典型调查，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之间流入码头做工的工人中，来自工厂的失业工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一八年以前约占百分之二十七）。码头工人来源的变化，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的结果。数万码头工人长期处在半饥饿、半失业状态中，境况越来越恶劣，他们实际上是当时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对码头工人加倍的残酷迫害和码头装卸业务的日益停滞，码头工人数量大大减少，有些码头工人返回原籍；有些则离开码头，另谋生计；也有的人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估计这时的码头工人约为二万人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剩余物资”象潮水一样涌进上海港，充斥码头仓库，使上海港出现畸形“繁荣”，码头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直到解放前夕，上海港的码头工人约在三万人以上。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

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解放前码头工人长期遭受的严重剥削和残酷迫害，典型地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工人的遭遇。

二、血迹斑斑的工票

解放前，码头工人要上码头做工，必须先从包工头手里取得一张当天的工票，没有这张工票，这一天就没有工做，没有这张工票，即使做了工也拿不到钱。码头上的吸血鬼们当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发出工票，挑选最能榨取血汗的剥削对象，但一等到当天工作干完，劳动力的一次使用过程结束时，就立即把工人抛向街头，第二天重新另发工票。因此，使用工票更能便利吸血鬼们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力价格，更残酷地榨取工人血汗，并且更便于维护他们在码头上的反动统治。

码头上的工票，有的用竹片做成，上面烙有包工头的行号标记，有的是用豆腐干大小的纸条做成，上面盖着包工头的花押图章。不管什么形式，总之都是包工头临时雇佣工人的凭证。在旧社会，就是这一张工票，把码头工人紧紧束缚在码头门前。工人每天都必须自己带着搭肩布、杠棒、绳子，不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也不论是大雪纷飞，还是风雨交加，半夜三更就要起身，忍饥挨饿，一连几个钟头，甚至苦熬通宵守候在码头门口，等待包工头发工票。能够领到工票，这一天的工作才有了一点希望。领不到工票，就得另跑地方。

那时候，码头工人要拿到一张工票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每当码头到船少，或是阴雨连绵的时候，一连几天拿不到



为工票忍饥寒苦熬通宵

工票是常有的事。他们经常处在半失业状态中，每天都为出卖自己劳动力，求得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到处奔走，受尽了人间地狱的煎熬。正象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所说的：

码头工人苦，

一天有三愁：

早愁工作票，

中愁粮糊口，

晚愁无睡处。

纵然拿到了工票，这一天的工作还不能说有了着落。码头上的吸血鬼们为了能以最低的工资，得到最能供剥削的奴隶，对工人百般挑拣，特别是对新上码头的工人往往还要进行一番“考试”。所谓“考试”，就是趁工人冷不及防的时候，叫

几个爪牙拾起一件重包，猛然砸到工人身上，如果能挺得住，接得牢，就留下来干活，不然的话，就收去工票，赶出码头大门。

这种残忍、狠毒的“考试”，也是资本家和包工头剥削工人更多无偿劳动的一种方式。他们常常借口“考试”，逼着工人先干二、三个钟点的重活，然后再选择“合格”的发工票。有些体力较差的工人，为了能拿到一张工票，不得不拼命干，二、三个钟点拼下来，已经精疲力尽，做不动了，包工头就不发给工票，一脚踢开，这几个钟点的活也就白干了。

工人们经过重重难关拿到了一张工票，又通过“考试”，总算可以留下来干活了，但是这一天的工资还不一定能拿到手。万恶的包工头在工人劳动期间，还要不断地点名掉换工票，每掉换一次，旧的就作废，不能作为领工资的凭证了。包工头为了克扣工人的工资，通常每天要掉换工票二、三次以上，而且总是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因此，每一次总会有一些工人因上厕所或其他原因不在现场而换不到新工票，包工头便借此吞掉一笔工资。

工人们经过千辛万苦，累了一天下来，眼看可以拿到几个血汗钱的时候，吃人不吐骨头的包工头，还要千方百计玩弄各种花招，赖掉工人的工资。下面就是一位老工人的血泪控诉！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工人卢师傅守候在码头门口，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工票，就进码头夯大包。他侥幸地通过了“考试”关、“换票”关，最后拿到了一张纸工票。当时，工人都是赤膊夯大包，领到工票没处放，只好塞在裤腰里。几百斤重的大包，一包又一包地累得他汗流遍身，筋疲力尽，卢师傅拚死拚

活挨到了下工。不料工票被汗水湿透，字迹有些模糊。到账房间去结账时，包工头硬说这张工票是假的，赖掉他的工资。在旧社会里，哪有穷人说话的地方，卢师傅又气又恨，怒火满胸，紧握双拳，把一张汗水湿透的工票，捏成一团，劈面掷向包工头，转身大步冲出了码头。

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卢师傅的遭遇正是每个码头工人的普遍经历！码头上的老工人一提到工票，无限往事一齐涌上心头。小小工票浸透了多少码头工人的血汗，包含了多少码头工人的怨仇！每张工票，都是码头工人的一本血泪帐！真是：工票恨，工票怨，血汗滴滴洒上面，诉不尽码头工人的仇和怨啊！

三、累断筋骨的劳动

工人们千辛万苦拿到了工票，接着来的便是繁重的奴隶般的劳动。旧上海码头上的劳动强度可以说是世界上罕见的，不论多么重的货物，都是由工人拼体力来搬运。码头上根本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即使象公和祥和大来码头，装置了几部吊车，也是为了做做广告、摆摆样子的，实际上并不使用。对洋老板来说，码头工人的廉价劳动力比机器要合算得多，使用机器的费用远远超过低微的工资。因此这些吸血鬼与其使用机器，不如奴役工人，码头工人整天干着比牛马还要繁重的工作。

在封建把头的统治下，码头上的装卸工作被分割为杠棒、肩运、轮装、煤装、堆装等许多工种。其实不管哪种工作，总不外乎是用双手和肩膀来搬，主要的分工也就是肩运和杠棒

两种。

肩运工人除了一块破烂的搭肩布以外，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全靠肩膀来夯。所夯的货物大都是包子货，如米包、糖包、豆包、盐包之类，每包都在二、三百斤左右，负担十分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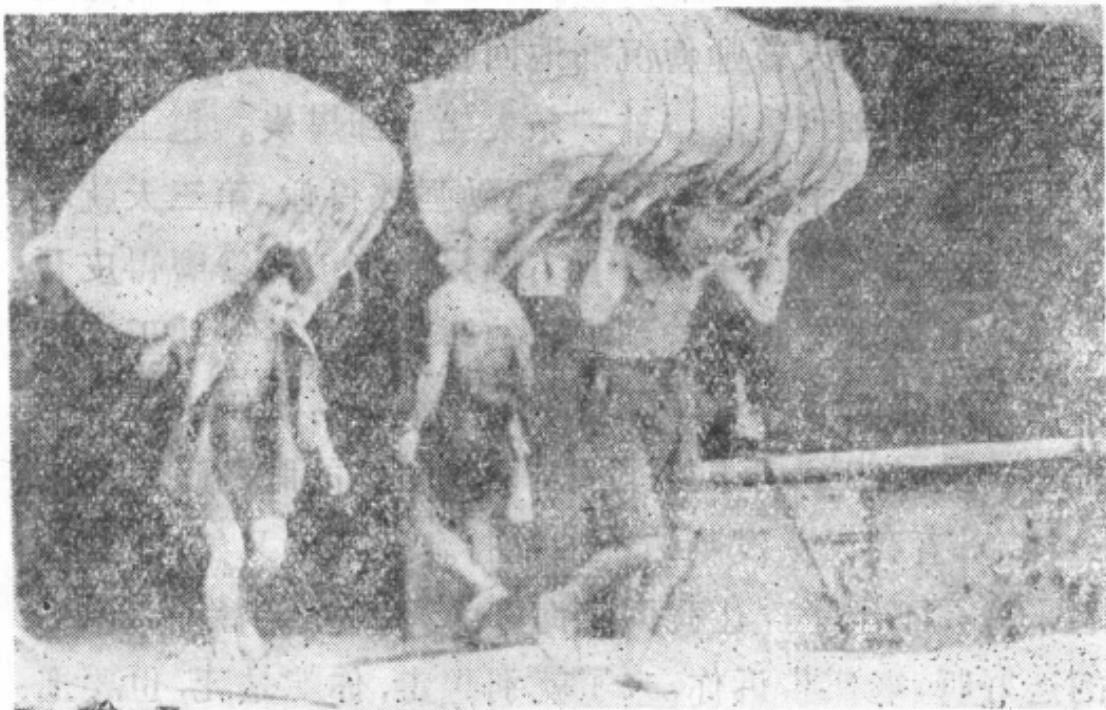
杠棒工人使用杠棒和绳索扛运货物，两人一档，遇到特别重的货物，也有需要几档或十几档杠棒一齐扛的。扛运的货物有棉花包、棉布箱、牛皮捆、烧碱桶、卷筒纸、生铁、钢板，以及其他箱装、捆装、篓装等货物，重量一般有四、五百斤，也有上千斤的。

码头工人承受着这样沉重的负担，不是一小时、二小时，而是一连十几个小时，在码头和仓库之间来来往往，每天少说也得跑上几十里的路程。说起旧社会码头上的道路，老工人都有满腔怒火。洋老板、狗买办只知道赚钱，根本不修路，码头上都是烂泥路或石子路，高低不平，三步一个坑，五步一个洼，到了下雨天，到处都是水塘，空手都难走，何况工人还背了几百斤的货物！同时，工人赤脚穿着草鞋走在石子路上，就象走在尖刀山上，肩膀压得重，脚底痛难熬，一双草鞋不到半天就磨穿了。尤其遇到数九寒天，工人的脚冻得发紫，裂开一道道血口，在石子上或在冻得僵硬的泥块上一摩擦，冻肿了的脚鲜血直流，一步一个血印。有时一天干下来，脚上的血肉和草鞋粘在一起，草鞋都脱不下来。

走平路这样艰苦，上楼更加困难。码头上的仓库很多是有几层楼的，象隆茂栈的一所仓库有三层楼，工人夯着几百斤货物从码头到仓库要走五百多步，进仓库上三楼再要爬八十二级阶梯，一天至少要跑几十个肩次，甚至一百多个肩次，跑到后来，两条腿就象灌了铁砂，提都提不起来。但是工人们为了

生活所迫，不得不拚着命，一步一步挨上高楼，好不容易上了楼，还要走跳板。码头老板为了节省仓位，货物要堆得齐屋顶高，用几条七、八寸宽的跳板搭起来，叫工人把货物送上去。狠心的包工头站在货堆旁边发筹子，堆上一包发一根，作为计数的凭据。工人要把货物一口气夯到仓库的货堆上才能拿到一根筹码，差一步都不算数。工人们一个跟着一个，不许掉队，脚步稍微慢一点，包工头的鞭子就会落到身上。如果体力不支，半路上歇下来，非但拿不到筹码，还要遭受包工头的打骂，甚至会被收回工票，赶出码头，一天的劳动都算白做。

肩运工干了一天下来，个个都累得筋疲力尽，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有时肩膀也被包子磨得皮破血流，如果是夯盐包，盐水渗到皮肉里，痛彻心头。沉重的包子压得腰干就象断了一样，弯不下身来。要想坐下来休息，只能背靠着墙，两手扶着，才能慢慢蹲下，要想睡觉，也只能就地一躺，睡倒就不能



上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出血汗，码头处处鬼门关

动弹。第二天早上醒来，浑身酸痛，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两手慢慢撑起来，挣扎着再去上工。肩运工干久了，常被压得背驼腰弓，两个肩膀高低不齐。杠棒工的情况也是如此，初抬杠棒，肩头上总是压得肿起出血，工人没钱医，只好买张豆腐皮贴贴，或者抓把破棉花包一包，一撕开就脓血直流，人都要痛昏过去。沉重的体力劳动，严重摧残了工人的身体。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揭露的：“已使劳动强化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程度。”

上面讲的是码头上的情况，要是在船舱里做轮装工人，那又是另一番苦境。轮装工人是在舱里起货的，不管几百斤的包子或者几千斤的机器箱子，都要由工人搬移，挂上吊杆，有的小船没有吊杆，劳动量就更大。加上舱里又闷又黑，没有通风设备，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在酷热的夏天，船壳铁板被太阳晒得滚烫；严冬时，船舱又象个冰窖。轮装工人上了船，就得把货物卸空后才能离开船舱，有时要连续干上几天几夜，甚至十几个昼夜。老工人曹师傅沉痛地回忆道：“有一年冬天，我们被包工头马二带到吴淞口外一条大船上卸煤炭。包工头逼着我们日夜不停地干活，头一两天还勉强熬得住，第三天就吃不消了，又累又困，眼皮直往下坠，两只肩膀被煤箩磨得皮开肉绽，血水直流。好不容易挨到吃饭的时候，拿着一块玉米饼坐到船舱角落里吃着吃着就睡着了。忽然浑身一阵火辣辣的痛，睁眼一看，包工头手执毛竹片，两只血红的眼睛瞪得象要吃人一样，对着我没头没脑的乱抽乱打。我又痛又气，撑着舱壁爬起来说：‘不干了，让我回上海去！’马二冷笑着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老实告诉你，来了就别想走，你就是死，也要把活干完，要不你就跳黄浦好了。’在天连水、水连天的吴淞口

外，我往哪里走啊！？就这样一直干了七个昼夜，才把船卸空，到了第八天，我们乘小火轮返回的时候，百十个人，个个都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把头马二，因为我顶撞了他，只发给我四十个铜板，其余都被他克扣去。我又累又气，回到家里就病倒了。”

那时候，码头工人“无工饿肚皮，有工拿命抵”。工人在码头上做工，生命毫无保障。吸血鬼们只顾自己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遇到装卸有毒物品时，他们就趁机收取一笔名为“防护用品”的费用，却根本不置办任何防护用具，强迫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搬运，因而码头上死亡、工伤等严重事故不断发生。如一九四〇年一艘意大利轮船装载了一种黄色粉状的有毒物品，停靠在公和祥码头。因为是有毒品，轮装包工头福安装卸行的老板向轮船公司索取了一笔额外补贴费，全部落入自己腰包，却说：“防护用品哪里有？谁死了算倒霉！”就叫小领班喊工人开工，工人不知底细，开工不久就倒下了一大片，结果三十四个工人中毒，一个工人死亡。受害工人家属要求包工头出钱治疗和殡葬，包工头却蛮横地说：“死个把人算什么？要钱上提篮桥（监狱）去要。”又如，有一次在外滩码头，工人们扛硝镪水，每次扛一件。外号“三土匪”的包工头跑来一看，恶狠狠地大骂：“谁叫一件一扛的？他妈的，给我两件一扛，快！”工人们没法，只好两件一扛。有个叫董老巴子的工人和另一个工人刚扛起两件，因为货物太重，船舱又高，一跤滑倒，董老巴子浑身都沾上硝镪水，痛得发颤，慌了手脚，急忙跳下黄浦江，当时正是大潮汛，就没能再上来，尸体在第二天才找到。

那时，工人在船上被吊杆的钢丝绳绞死，或在码头被落下

来的货物压死，或是从跳板上摔死以及落江淹死等等事故经常发生。一九四五年，有一次公和祥码头停靠一艘外国轮船，卸烟叶桶。开工前，工人发现船上吊杆的链条钩子坏了，不能使用，就向包工头提出，要船方调换钩子才能开工。包工头却横着眼说：“要命就给我滚，怕死不要做。”强迫开工。第一次吊起四桶，果然，大吊杆一抖，链条断裂，烟叶桶直落舱里，当场砸死一个姓沈的工人。事后，工人家属向包工头要丧葬费，他却说：“活的我都不管，还管你死的？耽误了船期，还找你算账呢！”

长期在码头做工的人，即使幸免一死，也往往不是断手断腿成了残废，就是得了吐血、小肠气等疾病。工人身带重病，也逃不出豺狼们的魔掌。有一位姓徐的老工人，解放前曾经在龙华日晖港码头扛一块大钢板，两吨多重，十二档杠棒二十四个人扛。刚一上肩走了没几步，老徐忽然觉得下身一阵剧痛，眼前金星乱迸，原来是用力过猛，小肠气发了。但他怕出事故，不敢下肩，一面拼命顶着，一面对包工头说：“我小肠气发了，不能扛，让我停下来吧。”包工头双眼一瞪，骂道：“他妈的，那来这么多噜嗦，死不了，不准停。”老徐又挣扎了几步，实在顶不住了，再向包工头要求歇下来。这回包工头却说：“你要歇可以，这二十三个人的工钱全归你付。”老徐一听，这分明是刁难，只得咬紧牙关撑到底，歇下肩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码头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是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也难以忍受，可是，吸血鬼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常常大量雇佣童工，名义上专夯小件货物。其实说是小件，分量也不算轻，如一捆芭蕉扇有三十多斤，一包面粉四十斤，这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负担是够沉重的。童工除了扛小包外，就

是滚油桶。说起滚油桶，真是苦不堪言。油桶有几百斤重，码头上的路坑坑洼洼，瘦弱的孩子，身子俯得几乎和地面一样平，使尽全身力气，汗水簌簌地往下滚。夏天油桶被太阳晒得象烙铁一样烫手，冬天油桶外面结了冰，手摸上去，有时皮都被粘掉。这样苦累了一天，得到的工资只有成年工人的四分之一。

码头上的女工，是资本家残酷压榨廉价劳动力的又一对象。女工大多数是在船上锹煤，船舱里又黑又闷，女工们弯着腰一锹一锹地把煤炭锹进煤箩，一天要锹几吨煤，一天干下来，两手皮破血流，腰伸不直，手抬不起，两只臂膀象长在别人身上，失去了知觉。在岸上做肩运的女工，夯着沉重的大包子，爬高楼、登跳板，累得喘不过气来，万恶的包工头，对女工百般刁难，包子上肩时，故意抬得高、摔得重，其劳累情况不难想象。那时的女工，如果怀孕、哺乳或经期，非但得不到照顾，还要瞒着包工头，否则就要被赶出码头。女工承受着如此非人的磨难，工资只有男工的一半。

解放前的上海港，多少码头工人累断了筋骨、饿断了饥肠，而洋老板、狗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等一群豺狼，拼命吸取工人的膏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四、“过山跳”和“螺丝跳”

什么人似虎狼张牙舞爪？

什么人似牛马终日苦劳？

什么人设下这“过山跳”？

什么人走不完“独木桥”？

.....

这是革命样板戏《海港》中老工人马洪亮的一段唱词，字字血、声声泪，代表着上海港码头工人对万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解放前，在那“过山跳”下，不知有多少码头工人象韩小强父亲一样，含恨死去！

解放前，码头上的装卸工作，总是离不开跳板，尤其扛煤炭的工人更是经常要在跳板上操作。煤炭从轮船上卸下来或是堆上“煤山”，都要搭起又长又高的跳板，有时两座“煤山”之间也要搭跳板，这都叫“过山跳”。“过山跳”的跳板一尺多宽，三、四丈长，通常都是六、七块相连，就叫“六级跳”或“七级跳”，也有多达十余级的，一般离地一、两丈高，最高的有二、三层楼房那么高。扛煤工人两人一档，扛着二百多斤的煤箩，整天在这又狭、又陡、又高、又长的跳板上来回奔跑，而且速度要快，稍慢一点，包工头就要打骂，甚至要收去工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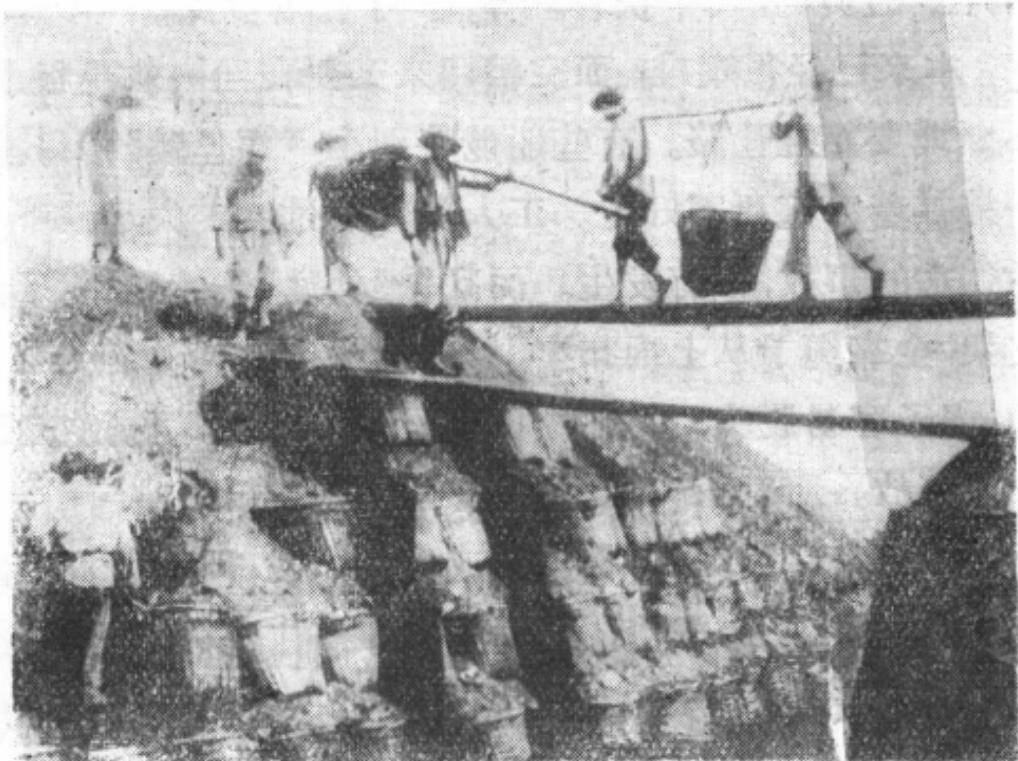
“过山跳”本来已很危险，上面还有一长队工人扛着煤箩奔走，跳板颤动摇摆，脚下更加不易踏稳。两个工人一前一后扛着煤箩，步子必须斜着跨，嘴里要喊着“号子”，前后才能协调一致。稍差一点，就会失足跌下跳板，再加上二百多斤的煤炭压在身上，不是头破脑裂，便是断腿折腰。所以工人们常说：

过山跳，颤悠悠，
前脚斜，后脚扭，
一脚踏空命便休。

遇上不好的天气，“过山跳”就更加危险。黄浦江上经常刮大风，跳板搭在船边上，摇摆得更厉害，而且煤船卸到后来，

船舱空了，船身浮起，如果再碰上涨潮，船舷高出码头就有两丈以上，跳板也就更陡。下雨下雪的时候，跳板又湿又滑；严寒天气时，箩绳冻得硬，跳板上结起了冰，真是寸步难行；夜间开工，灯光阴暗，一丈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楚，危险性就更大。那时候的码头工人不论什么天气，都得拚着性命上跳板，因此工伤死亡事故经常发生，在跳板下面丧命或残废的工人不计其数。所以那时工人们都把“过山跳”叫作“绝命桥”，他们说：

绝命桥呀绝命桥，
扛着煤箩桥上跑，
过得桥来几块饼，
过不得桥来命一条！



过山跳，颤悠悠，一脚踏空命便休

另外还有一种“螺丝跳”，更是折磨人的操作。“螺丝跳”是在船舱里起货用的，有些船的舱口小，舱底深，船上没有吊杆，

只能用人力起舱，由工人用杠棒箩筐一箩一箩的扛上来。当货物起到下层时就要搭跳板，因为船舱小，跳板必须一块一块弯着搭下去，象螺丝一样，逐级弯到舱底，所以叫做“螺丝跳”。“螺丝跳”的跳板只有一尺多宽，十来尺长，搭的时候从舱口悬空搭起，第一块跳板的上端和舱口并齐，用绳子扣牢，斜着下去，下端搁在一块横档上，横档也用绳子扣在舱口上，下面再横着搭上第二块跳板，这样一级级搭下去，直到舱底，都是悬空用绳子扣牢的。船舱有一丈多深，就需要接上六、七截跳板，沿着船壁转一圈半，才能到达舱底。工人们就在这种跳板上转来转去，扛运货物。

在这种又短、又狭、又陡，弯曲相接的跳板上，工人们扛着几百斤重的货物，一手扶着杠棒，一手拉着箩绳，一步一步转上来，本来已经很艰难，而空档回来又要在同一块跳板上走，就不断地要相互让路。有些船舱特别小，“螺丝跳”搭得挤，两人一档扛着箩筐更不好走。工人因劳累过度，失足跌下舱底以致伤亡的事故，常有发生。而且“螺丝跳”是悬空的，下面没有支架，全靠绳子从上面扣牢，跳板上又有人负重行走，不断摆动，绳子容易脱头，跳板塌下来，也常发生压死或跌死工人的严重事故。所以工人们都称“螺丝跳”为“要命跳”。

上“螺丝跳”的工人，都要劳动力特别强，但是过着半饥不饱生活的码头工人，即使还能勉强支撑得住这样的活，在这种跳板上扛着货物，一天转上十几个小时，也要累得精疲力竭。干这种活由于吃力过重，特别容易引起小肠气、肾囊肿大的疾病。所以，工人们看见“螺丝跳”就犯愁，可为了生活又怎能不干？他们说：

螺丝跳，弯弯扭，

豁出性命“跳”上走，
累断了三条筋，
吃不上一碗粥。

有的船小，连“螺丝跳”也不好搭，就用木板搭成一层一层的“脚手”，工人站在“脚手”上，用手和肩膀把货物顶上舱面。顶的时候，一个工人先蹲下来，由别的工人把货物上肩，然后慢慢站起来，用肩膀往上顶，每一道肩只能顶上一公尺，由舱底到舱面一般要顶三、四道肩。顶的货物有二、三百斤的米包、糖包，也有四、五百斤的棉花包。一个工人一天至少要顶上六、七十包，甚至一百多包。顶到后来，腰不能伸，腿不能弯，这样非人的劳动，简直就把工人当作不需要加油的“活机器”。

“过山跳”和“螺丝跳”，突出地反映了码头工人在三座大山压榨下劳动条件的恶劣。

说起解放前码头上的劳动条件，老工人们都有着诉不完的苦水。那时候码头上的劳动，即使在数九寒天，光着背也会累得满身大汗，渴得要命，但是却连一口水也喝不上。码头上只是在每年端午节到中秋节一段时期才供应茶水。这种茶水，不过是挑两桶开水，再搀上几桶自来水，或者干脆就是搀上黄浦江水。搀上生水的原因，一来是包工头为了省钱，二来是怕工人喝烫开水耽误时间。甚至就是这种生水，工人如果多喝几口，包工头就会抢过喝水的竹筒，赶着工人去干活。喝水都这样困难，洗澡就更不必说了。工人在下工以后，全身衣服都可拧出汗水来，要是装卸煤炭，更是浑身乌黑，汗水和煤屑粘在一起。但工人们却无处洗澡，只好用混浊的黄浦江水洗一洗，或者在轮船的污水管下面冲一冲就算洗了澡。

恶劣的劳动条件，严重地摧残着码头工人的健康，因而工人们疾病很多，普遍的职业病就有：胃病、小肠气、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气喘、吐血、气管炎、高血压、关节炎等等。而且一个工人常常同时患着几种疾病。那时候工人生了病，就不能做工，连生活都成问题，更不知道“药”是什么味道。“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贫病交迫的结果，码头工人的死亡率很高，幸存的工人也都很早就丧失了劳动力，很多工人一到中年就不能再干活了。黄浦码头有个夯包能手名叫洪大，年青时二百多斤的米包能夯两个，面粉能夯十包。可是到了四十岁光景，连一包米也夯不动了，最后，被包工头赶出码头，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冻死在大连路公共厕所的旁边。

码头上的剥削者如此残酷地压榨工人，而他们却还恶狠狠地说：“工人不能有余粮，吃饱了饭就不肯来干活了。”这班吸血鬼就是按照这个吃人的逻辑，用饥饿逼迫着工人来替他们卖命的。

五、悲惨的生活

码头工人拚着性命出尽了力，能拿到多少工资呢？说来令人可恨，工人到手的工资，连最低生活都很难维持。在抗日战争之前，码头工人中劳动力最强的，一天约能挣到二百个铜板左右，一般的劳动力只能拿到一百多个铜板，劳动力差的就很难说了，只能干些零碎活，有时几十个铜板，有时十几个铜板。而且那时码头工人不是每天都有工作的，一般来说，一个月能做上十几天就算不错了。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工资，还要被迫向包工头“送礼”，以及应付各种各样的勒索。这样七折八

扣的结果，最后拿到手的几个钱根本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养老，不养小，养个中年吃不饱”。这就是工人们对自己解放前生活状况的写照。

那时候，码头工人都是做一天吃一天，吃了上顿无下顿，家里没有隔日粮。许多工人半夜起来饿着肚子上码头，等到领着工票，才能向码头门口的摊子上赊几只大饼，吃了好有力气干活。如果领不着工票，这一天工作没有希望，就连大饼也赊不上。所以码头工人常说：“背着包子上了岸，不吃豆渣、菜皮就讨饭。”

豆渣、菜皮是码头工人经常的食物，除此以外，就是霉烂生虫的玉米粉、麸皮面，混和着捡来的菜皮煮成稀糊，一天吃上两顿。有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碎米煮粥就是最好的食物了。遇着没有工作的时候，往往几天揭不开锅盖。在抗日战争期间，码头工人生活更困难，停顿断炊是常事。广大码头工人经常过的是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寒相连，码头工人食不果腹，当然也是衣不蔽体，终年都是“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所谓“八卦衣”，就是许多补钉相连的破衣服，码头工人无论冬夏，都是一套破衣在身。有一位老工人一条单布裤穿了二十多年，破了补，补了又破，破了再补，不知补了多少层，由于补钉太多，一条单裤竟有四斤半重；另一位老工人一件破夹袄足足穿了二十八年；还有一位老工人十九岁那年，花了二百多个铜板在旧货摊上买了一件旧棉袄，整整穿了二十三年，直到上海解放。那时候，码头工人冬天能穿棉衣是不多的，一般都是两条单裤过冬，能有条破麻袋围围身的就算不错了，有时冻得实在吃不消，只好用稻草裹在腿上，避避寒气。他们终年赤脚，几个铜

板一双的草鞋平时也舍不得穿，塞在腰里，等做工的时候才拿出来穿。对码头工人来说，草鞋就象“金丝鞋”一样的宝贵，穿破了也舍不得丢掉，往往找些草绳修补了再穿。

衣鞋尚且不周，被褥更不用说了，寒冬腊月，只能拣块破麻袋片盖盖。有的工人家里即使有棉被，也不过是一堆千穿百孔的破棉絮，盖在身上，挡不住寒气，遮不住风。工人老徐一家大小七口，合盖一条破棉絮，盖了这个那个冷，盖了这里那里冷。就是这样的破棉絮，还盖了三十多年，没法更换。

住的问题更加困难。旧上海是寸土寸金，房屋虽多，却没有码头工人的容身之处，许多码头工人只得露宿街头，“青天当作屋，垫的自己脊梁骨”。外滩有条元芳弄，过去被叫做“穷汉窝”，每夜都住满了码头工人。靠近十六铺的金陵东路两旁人行道上面有骑楼，可以遮避风雨，所以就成了工人栖宿的地方。往往五、六尺见方的一块地方要睡上几个人。去得早的沿墙脚找块地方躺下，去晚了的只得睡在马路边沿，不但要受风吹雨淋，而且还得挨外国巡捕的大皮靴。如果遇到台风和潮汛，马路上积水很深，那就连这样的地方也都睡不成了。有一位姓刘的工人，解放前在金陵东路人行道上睡了七八年，直到解放后才搬进了工人新村。

到了冬天，睡在马路上更难熬了，工人们只好挤到公共厕所里过夜，避避风雪。因而靠码头附近的公共厕所里，每年冬天都住满了码头工人。象老工人柳师傅从十二岁到十六岁，就在外白渡桥下的厕所里住了整整四年。但公共厕所是有限的，哪能容纳许多码头工人？大部分还只能露宿在马路上，遇到寒潮侵袭，每次都要冻死很多人。如在公和祥码头做了

四十年工的夏小四子，在一九四八年的一个大雪天晚上，就冻死在永定路口。



码头工人的“住所”——船艖船

有些拖带家眷的码头工人，只能住在从家乡摇来的小船上。那时苏州河上，密密麻麻的挤着这些船艖船（芦席作篷的一种小木船）。贫穷的主人住到船破底漏，再把破船搬上岸来，继续作为一家老小容身之所。有的工人在江边荒地上搭个草棚，就算安下了“家”。解放前，浦东和杨树浦沿江一带遍布着这种棚户，其中很多就是码头工人的住所。在这些棚户区里，到处都是垃圾堆、芦苇、臭水浜、乱坟堆，疾病流行，环境非常恶劣。码头工人所住的草棚，也都是些不能遮风挡雨，又低又矮的“滚地龙”。“滚地龙”没有门，用一块破搭肩布一挂，就算是“门”了。工人老吴在紧靠码头厕所的砖墙外，用芦苇搭成一个小棚子，一家人住在里面，夏天又热又闷，冬天浑身冻僵，有时地上结了冰就不能睡，一家人只好挤在一起，

相互取些暖气。当时有一首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滚地龙”的情景：

穷苦码头工，
住的“滚地龙”；
外面刮大风，
“屋”里样样动；
天上下大雨，
地下盆、罐、桶。

有些工人勉强凑一些钱租房子住，但情况并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住的都是又低又暗的小搁楼，往往是几个人、甚至是几户人家合住一间面积只有几个平方米的亭子间。工人陈师傅等八个人合住一间小搁楼，夜间出去小便，回来就伸不下脚了。拥挤情况可想而知。

解放前，码头工人的苦难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子女死亡率特别高。那时候，码头工人家庭，生两个孩子也难养活一个，有的工人生了七、八个子女，甚至一个也没有能留下来。至于侥幸能活下来的工人子女，在他们刚懂事的时候，就得出去捡破烂或者当童工，当然谈不上什么读书识字。他们和父母一样，绝大部分都是文盲。

解放前有一首“头字令”的歌谣，它集中地描述了码头工人的苦难生活：

肩膀上压竹头，
背心上挨拳头，
做工拿零头，
天天吃野菜头，
身上穿破布头，

腰上束草绳头，
晚上睡在大街头，
身上盖着麻袋头，
苦难日子没尽头，
不砸烂旧社会出不了头。

这就是码头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码头工人对旧社会的愤怒控诉！码头工人在旧社会吃的这些苦头，真是“寒冬喝冰水，点滴在心头”。血腥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码头工人的死对头，只有坚决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四章 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早期的风暴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码头工人的残酷压迫，必然激起码头工人的坚决反抗。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上海港码头工人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诞生的，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统治不断地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而且很早就和其他阶层人民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早在一八五三年，上海码头工人就积极参加小刀会的武装起义，英勇地投入了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当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以后，码头工人又和农民一起胜利地攻占城外的海关，并把清政府储藏在海关内的枪械全部搜查出来交给起义军，使革命队伍得到大批武器和有力的支援。一八九八年，上海码头工人振臂而起，英勇地参加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扩大租界，拆除四明公所（宁波会馆）的斗争。当法国侵略者用武力霸占四明公所，屠杀中国人民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码头工人立即罢工，拒绝替外国侵略者搬运货物，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维护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上海码头工人在开始

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广泛地掀起反对剥削和奴役的经济斗争。虽然当时码头工人的斗争规模不大，而且比较分散，但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扩大和加深，码头工人的反抗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些斗争已经象黄浦江的怒潮，一浪高一浪，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

一九一四年六月，华通码头爆发了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华通”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座码头，位于浦东高行浜旁边。这个码头有个把头叫张锡华，流氓出身，他投靠帝国主义后，由于对工人心黑手辣，很快成了帝国主义的宠儿，当上了华通码头的大包头。这个家伙平时在码头上依仗洋老板的势力，勾结反动派的警察厅，又纠集一伙爪牙作为帮凶，无恶不作，把工人压榨得气都喘不过来。工人群众受足了这班坏蛋的气，忍无可忍，早已要找他们算账。这时正值码头上到船较少，码头工人的收入特别低微，常常三天两头吃不上饭，生活十分困苦。六月二日这一天，正当太古洋行一艘轮船停靠码头卸货，工人们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开展斗争，大家商议了一下，推派了余天才、杨开臣等四人为代表，去找张锡华，要求增加工资。那个时候，工人要见大包头，可没有那么容易。四个代表刚刚跨进张锡华账房间的门，这条恶狗就龇牙咧嘴，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说：“这里也是你们来的地方？”喝令手下爪牙，把余天才等四个人推了出来。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怒火万丈，纷纷拿起杠棒，离开码头，冲向张锡华的账房间，高呼：“不加工资，决不再干。”工人们的突然行动使得华通码头的洋老板和张锡华措手不及，非常惊恐。他们想要动武，可是见到工人们人多心齐，团结一致，一个个高举

杠棒，横眉怒目，把这群恶棍团团围住。平常张牙舞爪的爪牙们这时谁也不敢上前，而码头上又停泊着急待卸货的轮船，耽搁一天，损失就是几百两银子。结果，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在工人们一致行动的压力下，不得不软下来，被迫答允把工资从原来的每根筹子五文钱增加到七文钱。罢工取得了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反动气焰，大大鼓舞了工人斗争的意志。

此后，罢工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上海码头工人再次掀起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声势浩大，从个别码头发展为黄浦江两岸十七个码头全体堆装工人的同盟罢工。当时，由于铜币贬值，物价飞涨，码头洋老板向客户收取的力资是用银码计算的，而付给码头工人的力资却是用铜元计算，铜元贬值，也就是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工人拿到的力资，更加买不到什么东西，生活更加恶化。在这次罢工中，工人提出反对用铜元计算力资，要求每件单力由铜钱一点八文增为银洋二厘二毫。

罢工开始前，八百多名工人在小东门集会，发出“通知书”，要求改用银码，增加工资，否则“一体同盟罢工”。阴险狡猾的洋老板看到工人已经联合起来，不敢公然拒绝工人的要求，就采用了一条缓兵之计，他们以为，码头工人家无余粮，一天不做就一天没有饭吃，拖上几天，熬不住饥饿，就会自动复工的，因此，他们欺骗工人说：“要增加工资，可以和平商量，不可聚众罢工。”就在这“和平商量”的幌子下，故意拖延了一个月，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码头工人看透了吸血鬼的奸计，决心采取行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六日，十七个码头的工人毅

然举行罢工。当天，全体罢工工人奔赴北门外“月华楼”，召开群众大会，会后群众斗争情绪十分高涨，参加罢工的工人越来越多，各码头堆装工作顿时陷于停顿状态。这一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吓坏了上海的中外反动派，法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北洋军阀的淞沪警察厅和上海县署，派出大批警察、巡捕、包探对罢工工人进行武装镇压。但是工人群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八、十九日两天，“月华楼”被法捕房封锁，工人就改到城内福佑路继续举行集会，坚持罢工。反动派进行恫吓说：“聚众要挟，扰害治安，要严厉惩办”，力图扼杀工人的罢工斗争。

武装镇压也好，威逼恫吓也好，都不能动摇英雄的码头工人，他们始终团结一致，顽强斗争，终于战胜重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一月二十四日。最后，有些码头老板因罢工造成损失太大，被迫同意用银洋计算，工资也稍有增加，这次罢工胜利结束，大刹了中外反动派的气焰。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上海码头工人又多次举行罢工，不断和洋老板、买办、封建把头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包工剥削制度和打骂工人。

码头罢工斗争的蓬勃发展，反映了码头工人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都有了迅速提高。这个时期内，码头工人所进行的斗争，虽然主要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但这些斗争对于打击敌人，锻炼自己，抵制吸血鬼的剥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海码头工人就是经过了这一连串的罢工浪潮的锻炼，逐步提高了觉悟，开始了第一次全港码头工人的政治大罢工。

二、五四运动中的斗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商议分赃，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会议竟然决定由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德帝国主义在中国山东省所占有的特权，而且，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这一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罢课，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警察进行镇压，并且逮捕了学生三十余人。

这个消息从北京传到上海，全市人民群情激愤，纷纷集会游行，提出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政治主张。接着，上海人民又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五月二十五日，浦东的码头工人，宣布停止装卸日货，数百名码头工人在老白渡集会，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会议一致决定，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一律拒绝卸货，并分发传单，号召全港码头工人拒绝卸运日货。五月二十九日，日商码头老板指使包工头用金钱诱骗工人装卸日货，苦大仇深的码头工人坚决抵制，指着包工头的鼻子予以痛斥，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破坏抵制日货运动的阴谋不能得逞。

从六月三日开始，北洋军阀政府加紧了对革命群众的镇

压，在六月三日、四日两天中，竟逮捕学生一千一百余人。在这严重时刻，上海工人英勇奋起，举行了空前未有的政治大罢工，六月五日，码头工人也投入了全市人民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九日，罢工斗争更加深入，当时报纸报导：“虹口各码头，日本邮船码头已无华工踪迹”。十日，罢工达到高潮，在码头工人、海员工人、驳船工人一致行动下，迫使港内各国商船完全停航，数十艘外国轮船象一只只死猪漂浮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不能动弹，平时拥挤嘈杂的黄浦江顿时冷冷清清，一片寂静。

在全国人民坚决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终于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五四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毛主席说：“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从六月三日开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对于这次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长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上海码头工人，在这次革命风暴中经受锻炼，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

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大力组织工人运动，在码头工人中也开展了工作，党派遣一些同志进入码头，组织码头工人的革命运动。在浦东码头工人聚居的地区，开办了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讲授文化知识，使工人明白受剥削

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团结战斗的革命道理；同时，通过访问工人家庭，关心工人疾苦，团结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并把有觉悟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组织准备。在党的教育和组织下，码头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罢工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天天走向高潮。一九二五年五月，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五卅运动，首先从上海开始。五月十四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反对厂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向罢工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杀害了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一野蛮的暴行激起全市人民无比愤怒。五月三十日，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和学生进行了反帝示威，码头工人也投入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复仇！”等口号。英、日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妄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来扑灭这场革命烈火。这天下午，英帝巡捕突然向南京路上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受伤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这次血染南京路的斗争中，码头工人也有多名光荣负伤。

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敌忾同仇，情绪万分激昂。中国共产党中央当晚作出决定，号召全市人民罢工、罢学、罢市。六月一日，全市有二十多万工人举行罢工，码头工人三万余人相继投入斗争，他们怒火中烧，坚决离开码头，誓死不装卸仇货。

接着，海员和港内驳船工人也同时罢工，这样，海港完全瘫痪了，二十多个日帝和英帝的码头全部被迫关闭，许多外国轮船停泊在港内，船上的货物不能卸运，开不出港。到六月十九日，被迫停在港内的日、英轮船共达八十五艘，驳船和运货小轮也有四十三艘。到了六月二十五日，行驶于日本各港与上海之间的日轮也都被迫停航，上海海港工人给了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

但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疯狂的反扑。日本和英国侵略者调来了大批军舰，成千的侵略军陆续在码头登陆，继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的疯狂屠杀又开始了。六月二日，三名码头工人在杨树浦码头被英军打死，数人被捕；六月十七日，英舰“达哇米号”派出海军陆战队强迫工人装货，并对罢工工人进行袭击；七月七日，英、法水兵及大批巡捕在太古码头用刺刀刺伤工人六名，重伤二名，还有三名工人被投入黄浦江中，活活淹死。帝国主义简直象疯狂的野兽，对码头工人犯下了血腥罪行，赤裸裸地暴露了它们最凶残、最野蛮的本质。

然而，革命的火焰没有被扑灭，也是扑灭不了的。码头工人面对帝国主义的凶残镇压，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继续打击帝国主义。蓝烟囱码头的英国资本家以为在血腥的镇压下，工人不敢再抵抗了，公然指使包工头收买一些人上“泰坦轮”卸货，工人们知道后，愤怒地冲进码头大门，占领了“泰坦轮”停泊的码头，阻止卸货。包工头见势不好，妄想逃走，工人们怒火万丈，再也忍耐不住，阶级仇，民族恨，一齐涌上心头，大家蜂拥向前，把这个包工头痛打一顿后投入黄浦江，使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向欺压工人的包工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外滩和华通码头。外滩码头一个姓陈的包工头，企图欺骗工人装卸外国货，伪称是去浦东栈房运中国货，工人们揭穿了他的诡计，把他押送总工会。华通码头一个外号“小华龙”的包工头充当敌人工具，妄图为侵略者偷运煤炭，被工人们发觉后痛打一顿。码头工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保证了全港罢工的胜利进行。帝国主义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七月二十八日夜间，日本汇山码头到了一艘日本轮船“熊默丸”，装来纱布二千四百余吨，因见工人罢工，拒绝卸运，帝国主义分子妄想以重金利诱工人复工，答允每人发三块钱工资，而工人们坚决回答说：“不要说是三块钱，就是每人给三百块也决不上工。”码头工人这种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坚决反帝的革命气概，使得帝国主义分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他们的阴谋诡计一个接一个破产了。

码头工人在战斗中，加强了革命团结。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七月七日，在上海总工会帮助下，以原有几个码头工会为基础，成立了新的码头工会——上海运输工会，统一组织工人的斗争。

码头工人的罢工从五月下旬开始，坚持到八月中旬，屡次击破了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的破坏，有力地支持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但是码头业的中国资本家却只图私利，竟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在广大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中，偷偷地与帝国主义勾结，把码头供给外国轮船停靠装卸，破坏码头工人的罢工。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又故意扣留各方面对罢工工人的经济支援，妄想使数万码头工人的生活陷入绝境。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码头工人派出代表前往总商会

会长、大买办虞洽卿家中索款时，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非但扣留各方面的捐款不发，反而要工人停止罢工，保证“洋货通销”。资产阶级的出卖妥协行为，虽然增加了码头工人生活上的困苦，但是他们坚强不屈，不顾种种威胁利诱，仍然坚持斗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可贵的革命精神。后来，党为了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决定结束这次罢工。码头工人在这次斗争中的卓越表现，为上海码头百年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参加三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这次起义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等地，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二月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发出总同盟罢工令，黄浦码头接总工会命令后，即于当日六时举行罢工，其他码头也纷纷响应。这次全市罢工人数共达三十六万人，码头工人有三万余人。二十二日，武装起义开始，各区工人勇敢地向反动军警防线与步哨进行袭击，一时杀声震天，战斗十分激烈，但由于北伐军没有及时进攻上海，这次起义也失败了。

接着党以更大的革命毅力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码头工人按照党的指示，把枪枝、斧头、手榴弹等武器秘密运到浦东，储藏起来，暗中学习使用，积极准备战斗。三月二十一日，当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的时候，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当日上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颁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八十万罢工者共同行动，全市工厂正在运转的机器，一时都停止了转动，商店关上了店门，马路上行驶的电车停驶了，铁路交通全部断绝了，轮船上的起货吊杆也不再转动，参加罢工的码头工人奔向预定的集合地点，全体罢工者都组织起来，武装的纠察队在前，广大群众在后，纷纷朝着警署、兵营发起攻击。浦东参加起义的码头工人、香烟厂工人、纱厂工人和铁厂工人等数百名起义者，首先进攻一向猖狂压迫群众、残害工人的第三区警察署，纠察队员冲上前去，用枪封住警察署的大门，里面吓慌了的警察，乱成一团，最后全部被迫缴械。群众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并乘胜攻占了陆家嘴、新三井、老三井、杨家渡等四个警察分所。当起义队伍沿着黄浦江抵达杨家渡码头时，发现有一小股反动军队，企图乘船逃跑，起义群众马上组织截击，这时停泊在黄浦江面的英国军舰竟然向工人开炮，支持反动军阀。但工人们沉着应付，终于迫使五、六十名企图逃跑的反动军阀官兵缴械投降。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后几场激战集中在闸北地区。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第二天午后六时止，前后激战三十小时。沪东码头工人派出武装纠察队赶去增援，他们到达闸北后，即与闸北工人和前来支援的沪西工人一起，在天通庵车站袭击敌人自吴淞开回的兵车，他们拆毁路轨，当敌人兵车开到时，“轰”的一声巨响，敌车出轨倒地，敌人死伤无数。但兵车上残存的敌兵仍然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码头工人组成的突击队多次与敌军展开肉搏。二十二日正午，起义队伍发起了总攻击，数百工人一片怒吼，“冲啊！杀军阀啊！”一个个勇猛地向敌人扑去，军阀的部队溃败了。被围困在车站的三百

多名敌军，全部缴械投降。在这次战斗中，青年码头工人陈阿福、王绍爱壮烈牺牲，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天通庵车站被攻占不久，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也被起义的工人占领。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胜利。

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踏着革命工人的血迹走进了上海，他一方面假惺惺地把写有“共同奋斗”的锦旗赠送上海工人阶级，一方面又暗中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在这历史紧要关头，陈独秀顽固地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反对加强工农武装，不作任何防止突然袭击的准备。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血腥大屠杀，三天之中，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五百多人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遍及全国。但是，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十月，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把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上海码头工人自此开始了支援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时，码头工人坚决“不运一枪一弹去进攻红军”，“反对装卸军火，反对运兵”，支援了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五、熊熊的抗日烈火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在此民族危机严重时刻，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码头

工人，抱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在党的领导下，于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反日大罢工，不为日本帝国主义搬运一件货物，不到杨树浦、虹口一带的日帝码头去做工，参加罢工的人数有三万五千人之多。为了配合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码头工人还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协助检查日货，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又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上海码头工人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拒绝为日本侵略军卸运军火。有一次，汇山码头运来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军火，找不到工人卸运，便通过三井码头的包工头张嘉德诱骗部分工人前往汇山码头。当工人看到是卸运军火时，都坚决不肯干，包工头就拿出银元，说：每人先发一块钱酒钱，卸完后每人再发十块钱工资。而工人却一致表示，即使饿死，也不愿为敌人搬运军火。日本侵略军看到利诱不成，又进行威胁，动手殴打、拘捕工人，但英勇不屈的码头工人，宁死不为敌人卸运军火，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放弃了大片国土。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实行极端野蛮的殖民统治，码头工人的苦难更为深重。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地进行了各种抗日活动。虽然工人生活越来越困难，但为了拖延敌人的船期，经常领了工票不去上工。有一次，黄浦码头停靠两条大船——“奉天丸”和“天津丸”，工人们一早领了工票，临到开工时，却纷纷走散，使得两条大船无法装卸，不能开动。有时开吊关的工人故意把吊关蒸汽放掉，使吊关开不动，货物也装卸不起来。工人们在被迫为敌人装卸货物时，也是乘机破坏，或是故意把货箱掼碎，或是用手钩把货包戳破，当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干脆把物资丢下黄浦江，造成敌人很大

损失。

抗日战争前期，英帝国主义势力还盘踞在上海，仍然残酷地压迫工人。不仅如此，它为了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把英帝码头变成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怡和洋行却把虹口、顺泰码头租给日本海军使用。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疯狂进攻，英帝公和祥码头乘机招揽军事物资的装卸，日军的大量战争物资就是通过这个码头转运的。敌伪占领期间，英帝华顺码头专门停靠伪满船只，成为伪满在上海的航运基地。英国老板种种敌视中国人民、破坏抗日战争的行为，激起码头工人无比愤慨。一九四一年八月，码头工人以反对抄身为导火线，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怒潮。

公和祥是旧上海最大的码头，也是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港的主要据点，经常需要大批工人装卸货物。抗战期间，公和祥的一桩主要生意，就是装卸大米。帝国主义者借口防范工人偷大米，在码头上建立了一套极端侮辱工人的抄身制度。当工人下工出门时，强迫抄身，每次抄身时不是撕破工人的衣服，就是对工人拳打脚踢。广大码头工人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身侮辱。八月十六日，全体工人为反对抄身一致罢工。罢工后，工人封锁了码头大门，不准货物和车辆进出。第二天，公和祥码头的买办甘炽先蒙蔽一部分人力车工人到码头上来装卸货物，因为码头大门已被工人封锁，就从黄浦江上用小船偷偷靠上码头，正要开始装卸货物时，就被罢工工人发现，工人们立即冲进码头，进行劝阻，一时受骗的人力车工人知道事情真相后，都自动离去。狗买办的阴谋没有得逞，又想用武力进行镇压。

第二天上午，提篮桥捕房开来一辆警备车，跳下一群持枪的巡捕，动手就要抓人。工人们一见，蜂拥而上，高呼：“要去，大家去！”一下子车上车下都是人，把警备车包围了，车上的玻璃也全部被砸碎，巡捕一看工人声势很大，不敢动手，只得灰溜溜地把车开走了。

下午，几辆警备车载来大批外国巡捕，手拿皮鞭、铁棍，见人就打，形势越发紧张。工人们早有准备，一齐退到码头大门对面弄堂的矮墙下，用砖头、石块回击敌人，顿时码头门前吼声震天，砖石如雨，打得外国巡捕头破血流，龟缩在码头大门后面，举枪射击。在得到增援后，敌人开始了血腥的屠杀。一阵枪响，工人顾万福当场牺牲，还有两个工人也身负重伤。在敌人枪林弹雨面前，工人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一个青年工人，冒着枪弹，手拿石块，勇猛地扑向敌人，当他把一个巡捕打倒后，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脯，负伤倒地。战斗持续了半小时，不少巡捕被打伤，他们躲在码头大门里面，不敢出来，工人方面也有一死五伤。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陆战队也赶来，工人见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方才向市区撤走。

流血斗争发生后，苏州河、外滩、浦东等地的码头工人纷纷起来声援，并为自己的阶级兄弟送来药品、食物。罢工工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决定把斗争坚持到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谈判，答允工人提出的条件：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付给死者赔偿金和伤者医药费，增加工资，不许抄身。

为了扩大胜利的影响，工人们把为死难者的送葬，变成全港码头工人对帝国主义者的大示威。送葬那天，各码头参加的工人达数千人，受伤工人都乘坐汽车参加送葬，马路两旁人



群情激愤，坚持斗争

山人海，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由流血地点出发，经白渡桥、北火车站、海宁路回到高阳路，沿途高呼口号，情绪激昂。当送葬队伍经过提篮桥巡捕房时，敌人如临大敌，慌忙警戒，一个也不敢出来，只是战战兢兢地躲在捕房的屋角里向外偷看。

这次斗争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码头工人经过流血斗争的锻炼，更加坚强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敌人进行斗争，特别是在日本码头做工时，常常在下班前，机警地在仓库里遗下火种，造成火灾，使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汇山、黄浦等码头一再发生大火，造成敌人严重损失。如一九三九年，日本邮船会社码头大火，使日本帝国主义损失达二百万元。一九四〇年，吴淞黄浦江边的日本陆军堆栈突然发生大火，从上午十一时烧起，至下午四时尚未完全扑灭，烧毁了大量军用物品，连当天进出港口的船只都被迫停驶。熊熊的烈火照红了黄浦江，烧得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

六、战斗到天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物价飞涨，特务到处横行，使广大劳动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上海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配合解放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进行内战，蒋介石对人民实行了无比残酷的掠夺，码头工人的生活愈来愈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罢工斗争。一九四六年春天，大来码头三百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

饥饿。大来的美国老板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从杨思警察局调来三十多个武装警察，架起两挺轻机枪，把工人从早到晚包围了一天，但工人们坚持不屈，毫不动摇。美国老板害怕远洋定期客货班轮脱期，影响生意，不得不下令大包工头贾柏馨答允工人增加工资和不许打人等复工条件。一九四六年，美帝国主义的大批“剩余物资”不断运来上海，这些物资很多都是美帝国主义给蒋介石用来作为屠杀人民的工具。为了抵制这些物资运输，码头工人多次开展怠工斗争。二月，从虹口公和祥至杨树浦一带，数千码头工人实行怠工，使得大量“剩余物资”无法装卸。一个月后，太古码头一千多工人再次怠工。这样连续不断的怠工，打乱了敌人的运输计划，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反攻，蒋介石预感自己末日来临，还妄图垂死挣扎。五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请愿、游行，违者“格杀勿论”。反动派在码头上的一批爪牙也更加猖狂。董家渡包工头蔡学科就叫嚣说：“那个罢工，就是新四军，抓起来。”但英雄的码头工人根本不理睬这套，反而更加猛烈地发起攻击。就在反动法令颁发后不久，招商局第五码头工人把作恶多端的把头罗永坤包围起来，进行斗争。这个家伙见势不妙，仓惶逃窜，最后还是被迫答允了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年底，招商局九个码头全体堆装工人团结一致，反对包工剥削制度。这时处于全国人民齐声声讨中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敢扩大事态，不得不对包工制度作了一些改变。

上海码头工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党的教育下，逐步

地懂得了劳动人民要获得解放，必须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推翻反动统治，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少码头工人陆续奔赴解放区，参加了自己的武装部队——新四军和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军开始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反动政府面临土崩瓦解，急于劫运物资南逃，于是，一场反劫运的斗争在上海港码头展开了。虬江码头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最大的军用码头，仓库里堆满了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军事物资。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从各个港口调来大批船只，加紧搬运物资。为了阻止这批军用物资南运，虬江码头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利用稽查大队殴打工人事件，同敌人进行斗争。在打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工人们齐集码头，拒绝开工，要反动当局立即答应严办凶手，赔偿医药费，保证不再重犯，以及增加工资等条件。这一突然打击，使国民党反动派手忙脚乱，眼看一条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就要被卡断，运输计划搁浅，于是，他们一方面急急忙忙把殴打工人的仓库主任推出来向工人赔礼道歉，另方面又赶紧调来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稽查队对工人进行恫吓。然而工人们既不受欺骗，又不怕威吓，仍然坚持罢工。伪物资局几个头子被弄得束手无策，只好去向美帝国主义求救。后来，果然来了十来个美国人和一批国民党的装甲兵，但这些脓包只会欺压人民，那里能搬运货物，根本无济于事，特别对那些推土机、坦克等重型机械和武器，更加无法可想。罢工到第五天，反动当局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工人大部分条件，反劫运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取得了胜利。

解放前夕，反动派的残兵败卒拥塞在上海，黄浦江成了他



不许敌人劫运物资南逃

们唯一的退路。他们不但更加急迫地劫运物资，还想由此逃命，并且企图破坏港口设施。在这紧要时刻，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纠察队、保安队，监视敌人的行动，保护码头仓库和物资，同时用怠工的方式拖延物资的装运。敌人越急，工人越不使劲，匪军打人，就干脆停下来罢工。这样，反动派没有办法，只顾自己慌忙逃命，丢了下了大量物资。

上海码头工人，经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压迫统治，受尽了剥削和迫害，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解放前夕，又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反劫运、反破坏的斗争，保全了港口设施和大量财富，为迎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二篇

第五章 百年码头获新生

一、宜将剩勇追穷寇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土崩瓦解，狼狈逃窜。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欢迎亲人解放军。上海港的码头工人也和全市劳动人民一样，熬过漫漫长夜，盼到了光明；拨开层层云雾，见到了天日。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战斗。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这时，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解放全国的战争尚在继续进行；美蒋反动派的军舰还在长江口外进行着封锁，美蒋飞机也不断对上海进行轰炸、骚扰；反动派在溃逃前有计划地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分子，并且仍在不断派遣特务潜来上海，与隐藏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兴风作浪，制造谣言，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尖锐、复杂。

刚刚获得解放，满怀胜利喜悦的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粉碎美、蒋骚扰、破坏的激烈战斗。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掠夺。刚解放时，上海库存的粮食和煤炭所剩无几，极度缺乏。党对上海人民万分关怀，早已做好充分准备，预先组织了大批物资。解放军一进上海，大量的粮、煤便源源不断赶运而来，供应上海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在这场抢运粮、煤的战斗中，广大码头工人不辞辛劳，抢时间，争速度，快装快卸，保证全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一小撮盘踞在码头上的阶级敌人却乘机捣乱，阴谋破坏，他们与美蒋飞机的轰炸里应外合，制造事端，借故停工，拖延装卸时间，企图造成粮、煤供应的紧张，从而破坏生产和影响人民的生活。太古码头有一个包工头煽动闹事，唆使爪牙殴打工人，造成装卸工作停顿达一天之久。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止，这些反革命分子挑起的这类大小破坏事件就有数百起。广大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对这些坏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揭穿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粉碎了他们的破坏活动；同时出大力，耐大劳，日夜开工，抢装抢卸，忘我劳动，英勇奋战，为保证上海粮、煤的供应作出了贡献。

要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必须组织好自己的队伍。上海刚一解放，在党的领导下，码头工人开始筹建工会，把一向是流动的、分散的码头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更好的战斗。上海码头工会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当黄浦区码头工会开始筹组时，就有武装特务、封建把头陈浩祖纠集手下一批爪牙，打着“码头工会整理委员会”的牌子，妄图操纵黄浦、南市、虹口的码头工会。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码头工人揭发和控诉了陈浩祖的反动罪行，揭穿了他的阴谋，搜出了他私藏的武器，依法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

子。这一次斗争胜利后，首先在招商局第一码头、浦东其昌栈等码头建立了工会，以后各区也陆续普遍成立了码头工会。从此，上海港码头工人有了自己群众性的阶级组织。

码头工会成立了，广大码头工人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一心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多方进行破坏活动。有些恶霸把头公然对工人进行威胁，不准工人参加工会或和工会干部来往。太古码头特务、恶霸把头许士廉威胁参加工会的工人说：“国民党回来砍你们的头。”有些把头竟猖狂叫嚷：“谁要和工会干部来往就尝尝我小刀子的滋味。”还有些恶霸把头则想方设法混进工会组织，妄图从内部进行破坏。特务分子杨润森当时就窃踞了黄浦码头工会的领导职务。大达码头包工头、恶霸秦树明竟然冒充上海总工会的联络员，阴谋操纵工会，进行反革命复辟。有些恶霸把头还造谣中伤，挑拨工会和群众的关系。他们不让工人参加政治活动，工人开会的时候扰乱会场，阻止工人参加游行，不准工人唱革命歌曲。有个包工头在工会发给工人救济米时恶毒地造谣说：“谁领了救济米就要被送到东北去开荒。”

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充分说明，阶级敌人在末日已经来临的时候，必然要作垂死挣扎。广大码头工人对这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和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检举和揭发，依法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狠狠打击了反革命气焰。

广大码头工人在同隐藏在码头上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又取得了反封锁、反轰炸的重大胜利。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

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虽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仍然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上海解放初期，美蒋飞机就不断地对上海进行轰炸，美蒋军舰在长江口外进行封锁，妄图阻挠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的恢复。但是美蒋反动派的这一罪恶企图只不过是梦想。英雄的码头工人和全市人民一起，开展了一场勇猛顽强的反封锁、反轰炸的战斗，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坚持抢运、抢装、抢卸，夺得了巨大的胜利，使美蒋反动派的罪恶企图完全落了空。

当时，美蒋飞机连续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沿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也是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浦东的洋泾港、新汇山、张家浜，浦西的公和祥、金利源等码头都多次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是，敌人的轰炸不但吓不倒英雄的码头工人，反而激起了工人们更大的愤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在敌机的轰炸中争时间，抢装卸，以更坚决的行动来回答敌机的暴行。有一次，老白渡码头上抢卸煤炭，工人们在紧张的战斗中，已经听到了炸弹的呼啸声，但还是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有些工人在敌人轰炸中受了伤，这更加激起了广大码头工人无比仇恨。他们加快装卸，用实际行动回击敌人，为阶级兄弟报仇。码头上还成立了救护队和消防队，组织工人纠察队，协助解放军巡逻放哨，防止匪特破坏；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如构筑防空工事，利用煤炭堆成掩蔽体，在敌机的空袭下，仍然照常进行物资装卸，保证了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这场反封锁、反轰炸的战斗中，广大码头工人斗志昂扬，勇气百倍，装卸效率成倍地增长。例如鸿升码头停靠“江顺”轮，卸载一万多包粮食，只花了十二个小时，效率比平时提

高一倍；老白渡码头停靠一艘煤船，卸煤两千多吨，只花了一个工班多一点的时间，缩短船舶停靠时间六个小时。老白渡、张家浜码头的工人打破了过去“年初一不开关”的旧例，在春节初一的夜间抢卸了一千九百多吨煤炭。一九五〇年三月份，正是敌人空袭十分猖狂的时候，但是上海港的吞吐量却比刚解放时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份提高了三点六倍。这是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密切配合，英勇斗争的辉煌战果。美蒋飞机疯狂轰炸，妄图阻碍港口运输的阴谋完全被粉碎了。

码头工人不仅在码头岗位上英勇战斗，坚持装卸，而且高度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放弃休息，积极支援其他被炸的地区和单位。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美蒋飞机大肆轰炸上海时，港内许多码头都遭到轰炸，位于黄浦江边的杨树浦发电厂也被炸了。五百多名码头工人立即赶到发电厂，协助抢救。这时发电厂的输煤机因被炸坏而不能开动，向锅炉运煤发生了障碍，影响电力供应。前来抢救的码头工人立即组成杠棒队伍，代替输煤机，把煤炭送上四层楼高的平台，及时地供应发电锅炉所需的燃料。他们顾不得吃饭和休息，一面扛煤，一面啃着大饼，配合发电厂的工人弟兄，很快地恢复了全市电力的供应。又如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这天，大雨倾盆，码头工人出发到南市电厂协助堆置沙包，加强防空措施，被雨水淋湿的沙包足有二百多斤重，码头工人却一人夯起一包，在大雨中来回奔跑，只花了半天工夫，就把原来计划三天的工作量全部提前完成了。

在解放后的第一年中，码头工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在装卸工作中做出了成绩，为保证支前和人民生活立下了功劳。

一九五〇年五月，舟山群岛全部解放，港口有关部门配合人民海军清除了长江口外的水雷，排除了航行的障碍。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各地的生产迅速恢复，上海港的航运贸易迅速增长，码头上的装卸工作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二、扬眉吐气斗把头

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扫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码头上的统治支柱——封建把持制度还没有铲除，这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在解放后必须继续完成。广大码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取得了一系列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前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霸斗争，向码头上的封建把持制度发动了总攻击。

旧社会码头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在狼狈逃窜时，又在码头上有计划地布置了一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此外还有不少反动的残渣余孽以及外地潜逃来沪的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也把码头当作藏身之处，他们和原有的恶霸把头勾结起来，伺机蠢动，阴谋破坏，妄想变天。他们不断制造谣言，进行恶毒攻击。有的把头甚至暗中与美蒋特务组织挂钩，收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特务、恶霸把头何正松就偷偷跑到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去接受蒋帮特务的指示，潜回上海后，收集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并在浦东一带码头上张贴反动标语，散布反动谣言。在美蒋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和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时期，这批反革命匪徒气焰更加嚣张，如金利源码头汉奸、特务、包工头田永富竟向每

个工人勒索钱财，名曰“登记费”，说是“将来国民党回来了才可以给你们工做”。有些把头则暗中搜集抄写军代表和积极分子的名单，梦想反动派回来时反攻倒算。

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说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广大码头工人对这批恶霸把头、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痛恨已极，不断向人民政府揭发他们的罪行，并要求严厉惩办这批危害人民、破坏革命的反动匪徒。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的决定》。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上海港的部分码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霸斗争。一九五一年春天，码头上的反霸斗争又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全面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铲除封建把持制度的战斗打响了。

反霸斗争开始后，码头工人情绪高涨，斗志激昂，世世代代的阶级怨仇到了清算的时候。工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在码头上跳起了秧歌舞，高呼口号。他们举着红旗，沿着码头游行，码头工人家属和附近居民也聚集在马路两旁拍手欢呼。在反霸斗争中，工人们积极检举恶霸把头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踊跃参加公审大会，拥护人民政府逮捕法办这批匪徒，把盘踞在码头上作恶多年的一小撮坏蛋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浦东其昌栈码头的二百多个工人听到这个码头的特务、恶霸把头陈胜堂被公安局逮捕的消息后，高兴得跳起来说：“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搬掉了。”

长期遭受封建把头残酷迫害的码头工人，一致要求公审罪大恶极的把头，要求面对面地控诉他们的滔天罪行，要求在群众面前倾吐多少年来积在心中的苦水。全港各码头先后在

几个地区分别举行公审大会，许多老工人在会上控诉了恶霸把头残酷剥削、迫害码头工人的罪行。

杨树浦一带的码头工人在公和祥码头召开了公审“活阎王”张志发等三个恶霸把头的大会。一提起“活阎王”张志发，公和祥码头的工人个个怒火万丈。这个恶霸，解放前把持了公和祥码头四十年，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解放后继续作恶多端，坚决与人民为敌，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那天，黄浦、公和祥、招商局等码头的工人，举着“向万恶的恶霸把头讨还血债”的巨幅标语汇集在公和祥码头，整个会场挤满了满腔怒火的工人。在会上，有个工人手里拿着“活阎王”每天在码头上打人的鞭子，上台愤怒控诉说：“就是这个吃人的野兽，成天在码头上手执这根藤条，恶毒抽打工人。他打破了我的头，打得我遍体是伤，今天要向他算帐。”看到这根鞭子，工人们都愤怒得跳起来，公和祥码头工人哪一个人身上没有被这个恶霸抽过的道道鞭痕？哪一个人没有受过这个恶霸的迫害？工人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控诉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把头。最后一个姓虞的工人上台控诉恶霸张志发霸占他母妻两代，打死他父亲，后来又害死他母亲的滔天罪行。这个工人一面控诉，一面痛哭，激动得当场昏倒在台上。这时台下爆发起一片怒吼：“替阶级兄弟报仇”，“讨还血债”，“枪毙恶霸”，成千的铁臂在空中挥舞。

十六铺和南市地区的码头工人聚集在斜桥公共体育场公审许士廉、秦树明等四个特务、恶霸把头的滔天罪行。大会尚未开始，会场上早就挤满了五千多个愤怒的工人。当太古码头特务、恶霸把头许士廉等被押上台时，全场工人满腔愤怒，高呼口号，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镇压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



吐苦水，狠斗恶霸把头

分子。许匪是反动组织“十三太保”的头子，盘踞太古码头多年，吸饱了工人的血汗，解放后抗拒登记，暗藏武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复辟、变天。在会上，一个工人控诉说：“日伪时期，许匪拜大汉奸、大特务吴世宝做老头子，充当日本侵略军走狗，把自己的家变成小衙门，派他的爪牙手持铁棒、斧头站岗，常把工人抓进去毒打。有一次还指使手下爪牙把一个姓周的工人砍了八刀，又用毒药将周毒死。”这时，台下工人怒火满腔，爆发出一片口号声：“坚决镇压反革命”，“为受害的阶级弟兄报仇！”另一个工人手中举着一只大手钩冲上台去说：“这个恶霸把头以前拿这大铁钩钩打工人，一钩就是一个洞。我的叔父就是被他钩死的。我要求人民政府为工人报仇，镇压这个反革命分子。”这时，台下再次响起一阵阵的怒吼。在大会进行期间，收到了各单位送来的许多控诉信和不少电话，一致要求严厉惩办这批反革命罪犯。

公审浦东地区码头上罪恶累累的特务、恶霸把头郭炳萱等四人的大会在浦东其昌栈码头进行。特务、恶霸把头郭炳萱，解放前绰号“土皇帝”，抗日战争时期充当汉奸，杀害革命战士，强占工人妻女，是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姓金的工人控诉说：“这个狠毒的恶霸把头，在解放前害死了多少工人！我的弟弟就是被他活活打死的。”另一个被郭匪害死的工人的家属也在会上悲愤地控诉说：“我的丈夫被郭匪关在牢里打死，我的公公因而急死。家里剩下的一些东西，也被这个匪徒抢劫一空，我的两个孩子连饿带病死去，一家五口被害得只剩下我一人。”这时台下四千余工人怒不可遏，口号声震天动地，大家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郭炳萱！”

公审大会后，工人情绪十分高涨，纷纷要求继续控诉把

头的罪恶。后来，各码头上又分别召开了许多诉苦会，码头工人普遍参加了控诉。在会场上，工人们倾吐苦水，诉说自己过去亲身遭受的血泪史，控诉旧社会的罪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惩首恶，讨还血债。一些罪大恶极的把头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反霸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封建把持制度彻底铲除了，码头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广大码头工人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码头工人的翻身解放。他们把翻身后的热情带到工作岗位上，用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

三、码头企业的改造

反霸斗争的巨大胜利，消灭了码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还必须对码头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就为无产阶级改造旧码头企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提出了又一重要任务。

解放前，上海港的码头企业主要为帝国主义霸占，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前所占比重不大，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接收了一批日本帝国主义资本的码头企业，资产猛增，在全港码头仓库业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立即接管了这一部分码头仓库“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码头仓库的基本力量。一九五〇年，上海区港务管理局

成立，统一管理港口业务，这时港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份的码头约占全港码头总长度的百分之四十八；仓库约占全港仓库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这就组成了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码头仓库业的强大物质基础。

帝国主义资本的码头仓库业，在解放以前一向是依仗特权，攫取暴利。解放前夕，他们看到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上海必将解放，自己立足不牢，预先抽逃了大量资金，只剩下一些搬不动的建筑设备，无法带走。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对所有外国资本的码头仓库实行管理。但是帝国主义者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千方百计进行挣扎，他们拒不执行人民政府法令，对港口指泊的船舶不合作，不是借口没有仓库容量，不肯接受停靠，就是故意拖延时间以制造困难，并且长期欠交税款，拖欠职工工资；又听任码头设备腐烂损坏，仓库漏雨漏水，蓄意进行破坏。他们这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为，遭到广大码头职工坚决反对，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企业由于失去了特权，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接受了外资码头转让和歇业的申请。于是这些帝国主义霸占了百年之久的码头，才回到人民手中，获得了新生，开始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对私人资本主义码头仓库业的改造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解放前，码头资本家依靠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投机倒把而攫取暴利；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为了加强对私营码头仓库的管理，限制其盲目经营，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区港务管理局设立了私营码头仓库管理科。一九五一年四月，又公布了《上海港码头

仓库管理暂行规则》，规定私营码头仓库的转让、租赁和经营关系的变更，必须向港口管理当局申请核准，实行统一费率，限制私商从中牟取暴利。

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甘心放弃资本主义的腐朽经营方式，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总代理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大肆宣扬“剥削有功”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等反动谬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改造与反改造，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有的资本家不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把国营企业的领导叫作“公吃私”，把“公私兼顾”篡改为“平分秋色”，对工人的监督则百般抗拒，并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法进行破坏。在码头仓库行业中，有的资本家破坏国家运输计划，拒不装卸和堆存某些收费较低的货种；或是对国家储存的物资不注意保管，听其腐烂损坏；有的资本家随意转移码头仓库的租赁关系，擅自抬高租价，牟取非法暴利；有的资本家隐匿财产，抽逃资金，甚至连办公桌都藏起来预备盗卖。至于偷税、漏税更是资本家的经常手法。对于生产设备和工具，则只用不修，听其损坏，或是暗中拆卖，破坏生产。更恶劣的是，有些资本家竟然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等手法，贿赂国家干部，或者派出自己的亲信打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

一九五二年，广大码头工人和全国、全市工人阶级一起，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被打退了，码头上的阶级斗争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这为私营码头仓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码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已经成为码头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当时上海港的情况是：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港口吞吐量也相应增加，码头的装卸任务越来越繁重，而私营码头长期失修，损坏严重，泊位水浅，大轮船不能停靠；一座座码头被一条条保护私人产权的界沟界墙分隔着，妨碍统一使用；百分之八十的仓库漏雨漏水，影响存放货物的安全；码头上的道路高低不平，影响运输机械的运行。另外，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管理腐败，开支很大，效率极差。这一切，都说明了要不断提高码头装卸能力，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发展，必须对码头仓库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过码头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教育，私营码头仓库业资本家终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港二十六家私营码头、一百五十座仓库和堆场合并建立了公私合营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码头仓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一系列的裁并改合，上海港务管理局把全港码头先后划分为九个装卸区、三个装卸站，统一管

理，分区经营，码头上的生产力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前途。

码头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技术改造创造了先决条件。旧上海的码头仓库都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了便于侵略和掠夺，为了剥削工人血汗而建造的，他们一心只想花费最少数额的投资，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当时的码头、仓库建筑都非常单薄，设备十分简陋。在码头中，有一种投资最少的浮码头，就占着全港码头总长度的百分之四十二。这种浮码头随潮涨落，不但大轮停靠不稳，而且工人上下码头搬运货物时都要通过倾斜的栈桥，更增加了劳动强度。至于原有的一些固定码头，表面上看来虽是水泥建筑，但是结构单薄，负荷有限，根本不能使用大型机械设备。还有一些木质固定码头，更是残缺腐朽，浸蚀渗漏，已不宜使用。有些码头长期不曾疏浚，泥沙淤积，泊位水浅，已经不能停靠大船。至于码头上的仓库，更是七拼八凑，杂乱无章，不是屋面漏雨，就是地坪冒水。堆放货物的露天场地，也是积满了垃圾污水，长满了杂草。

码头上的道路过去是从来不加修整的，除了洋老板的住宅和办公室周围铺设一些平坦光滑的水泥路面外，绝大部分是高低不平、泥泞难行的烂泥路和碎石路，这种路“晴天三尺土，落雨一脚泥”，工人们夯着重货在上面走，不巧跌了一跤，货物压在身上，轻则折骨伤筋，重则就有生命危险。

至于码头仓库的建造更是盲目发展，布局混乱，有的地方只有码头没有仓库，或者有仓库而缺少码头，常常是来了船不能靠，或者是卸了货无处堆，这更加造成了解放前码头上一团混乱的景象。

这种种情况，完全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

也是旧社会所无法克服的。只有在完成了码头仓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码头仓库的技术改造才有了可能。

对于上海港码头仓库的技术改造，是根据毛主席关于“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的教导来进行的。原有的建筑和设备虽然破旧凌乱，还必须充分利用，尽量挖掘潜在力量，并按照不同情况，加以修理、加固和改建，使旧设备能够派上新用场。例如对旧的矮小多柱、不适用于机械操作的仓库，用合并的办法使之扩大，用拆层的办法增加高度；对高层仓库，用安装平台的办法，以利于使用吊车装卸；部分腐蚀朽烂的浮码头，陆续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码头；原有结构单薄，机械操作不便，基础下沉，容易上水的钢筋混凝土码头，加固的加固，加高的加高。这样，许多陈旧的和几乎不能再使用的建筑和设备，经过修理和改建，焕然一新，保持了良好的技术状态。

过去分隔各码头的沟、墙、篱笆和铁丝网都先后拆除，沿江码头连成一片，可以做到合理使用。例如原来的汇山码头只能停靠一条船，杨树浦码头只剩下几根木桩，已经不能停船，而且两个码头之间还有一条小浜和一条小马路分隔着。经过填浜拆路，把两个码头联接起来，再加上旁边的华顺码头，也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的固定码头，三个码头经过改建，联接一起，可以停泊五条江海轮船，码头使用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码头上的道路也普遍进行了改建，尤其是装卸工作逐步机械化后，对于道路的要求也更高了。路面不平，不但影响车辆行驶，机械容易损坏，而且装载的货物容易震动破损；雨天道路泥泞，妨碍机械的运行，也要影响生产。所以码头

上的道路，基本上全部改建为水泥路面，以适应机械化发展的需要。工人们再也不必下“烂泥塘”，上“尖刀山”了，他们看见这些平坦的水泥路，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工人们说：“就是没有机械化，夯起货物在这种路上走走也有劲。”

解放不久，上海港自力更生新建了一批码头和仓库。首先，利用日晖港旧有的开平和北票码头，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加以扩建，成为上海港第一座水陆联运码头，从此火车可以直接开上码头，货物可以直接从火车装进轮船，或从轮船装上火车，节约了大量中间转驳的装卸劳动。一九五九年，又在黄浦江下游建成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张华浜水陆联运码头，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上海港的落后面貌，港口码头设备更加现代化了。

与此同时，装卸工作机械化也有了发展。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码头工人的劳动条件，解放不久，就在当时的条件下，积极采取了各种措施，减轻劳动强度，保障工人安全。例如加宽跳板，起舱用木架及葫芦，代替了危险的“螺丝跳”。在洋泾港和董家渡两个煤炭专业码头，铺设运煤的轻便铁道，初步实现煤炭水平运输车子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港口开始添置了一些小型装卸机械，如拖车、铲车、木条运输机和皮带运输机等。皮带运输机的使用，对解放码头工人的肩扛劳动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在煤炭装卸操作中，效率提高二、三倍，劳动力节省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高头皮带机的使用，可以把煤炭直接堆上煤山，从而代替了过去的“过山跳”，解决了煤炭装卸中一项最艰苦、最危险的人力操作。工人们满怀喜悦地说：

皮带机，排成龙，

电钮一按煤直冲，
跳板不见了，
高凳无影踪。

以后，各码头又陆续添置了一批垂直运输机械，如电梯、塔吊、壁吊、高型链板输送机。工人们还开展技术革新，自力更生改造和自制了一些装卸机械和装卸工具。第三装卸区黄浦码头工人制成了一座装置在仓库上的电壁吊。这个区的工具组工人创造了用麻绳自制网兜代替络绳，既省力，效率又比用络绳提高一半。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了减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港机械数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三倍多，机械操作比重从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零点八三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八。进出港口的货物有将近三分之一用机械代替人力装卸了。

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改革和整顿，上海港码头起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迅速发展，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毛主席、共产党恩比天高

党在领导码头工人进行一系列斗争的同时，对工人们的生活也十分关怀。解放初期，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一时还不能立即清除，加上美蒋的封锁和轰炸，码头装卸业务比较清淡，工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着暂时的困难。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地组织工人开展生产互助，动员一部分工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并且采取了以工代赈，发放救济米等办法帮助码头

工人度过了暂时的困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码头生产迅速发展，工人们的生活也逐步改善。广大码头工人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翻身感更加强烈。经历过旧社会重重苦难的码头工人对新社会的幸福体会最深，对毛主席、共产党无限热爱。他们深深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码头工人的翻身，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解放前的码头工人是一无所有的奴隶，解放后的码头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工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解放前的码头工人都是流动工，长年累月奔波在黄浦江边，今日不知明日事，明日更为后日愁，生活非常困难。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会，接着又成立了搬运公司，负责管理装卸业务，码头工人工作和生活比较稳定了。但是这时码头工人还是通过工会或搬运公司的中间联系到码头上去工作，不是码头企业的职工，不能直接参加码头企业的管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情况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从一九五二年开始，码头的装卸业务便逐步移归港务局统一管理；同时又在反霸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把一向是流动的码头工编为码头企业的正式职工。

这一改革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工人能够直接参加码头企业的管理，更好地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这对码头工人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奔走相告，互相庆贺。一位老工人说：“我活了几十年，做梦也在想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广大的工人都说：“我们这些在旧社会里忍饥挨饿，挨打受骂的人，不但翻了身，

现在还当上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主人，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带来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特别是在发工作证那天，工人们兴高采烈，穿上新衣，带着家属，敲锣打鼓放鞭炮，喜气洋洋庆祝自己第一次领到工作证。

码头工人万分珍视这张贴有自己照片的大红工作证。从旧社会的工票到新社会的大红工作证，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苦的战斗！它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凝聚着毛主席、共产党对码头工人的关怀和恩情，没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没有烈士们的英勇牺牲，哪里会有码头工人的今天？哪里会有码头工人工作证？许多码头工人都把这张工作证叫作革命证，决心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码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码头工人不仅参加码头企业的管理，并且直接参与国家的各项政治活动，管理国家大事。解放后，不少码头工人先后被选为人民代表，参加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还有更多的码头工人被选拔为基层以及各级领导干部。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很多码头工人光荣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许多青年工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们决心为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党对码头工人安全和健康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码头上实行了劳动保险和各项劳动防护措施，使操作安全和工人健康都有了切实可靠的保障。

炎热的夏天是装卸工人最辛苦的季节。旧社会的码头工

人，在中外资本家、买办和包工头的重重压迫下，进行着极度繁重的劳动。尽管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却连喝一口水也很困难。而现在一到了夏天，码头上就采取种种防暑降温的措施，搭起了凉棚，遮蔽强烈的阳光，并且装置了许多电风扇和大型鼓风机，为工人们送来阵阵凉风。在轮船和铁驳船上，因为钢板容易吸热，还特意在舱面甲板上铺上草垫，派专人用水泵不断浇水，以降低舱内温度，保护工人少受炎暑的侵袭，减少疲劳。同时，还供应各种清凉饮料，如盐汽水、盐棒冰、绿豆汤、含盐菜汤等，供工人消暑降温，恢复精神。工人把清凉饮料叫作“定心汤”，在劳动紧张，汗流遍体的时刻，喝一口“定心汤”，浑身清凉，从心底感到舒服。这不仅仅是清凉饮料的作用，更因为他们从清凉饮料中体会到党的关怀，毛主席的恩情。有些老工人在休息时，常常端着清凉饮料对青年工人说：“在旧社会，替资本家干活，大署天我们百来个人自己凑钱买桶开水解渴，给包工头看见，还要骂我们偷懒。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到了冬天严寒季节，码头上又采取了各种防寒保暖措施。对露天作业人员配发御风防寒的棉大衣、棉背心，对夜班工人还供应红糖姜汤，抵挡夜间的寒气。遇到雨雪霜冻天气，在操作地点还要铺上草包、草席，增加安全网，防止滑跌等工伤事故。卫生站的医务人员准备了防冻防裂的药膏，发给每个工作组。工人食堂和夜班工人睡眠室都装上了保暖的厚门帘，睡眠室的床铺上也都铺上了厚厚的草垫和棉毯，放上清洁的棉被，供工人们休息睡觉。茶壶、饭箱套上了保暖套，保证工人吃到热茶、热饭、热汤、热菜，吃好、睡好、休息好，男女浴室里还安装了火炉或是自制的暖气管。

为了工人的生产安全，还备有各种劳动防护用品。日常操作时，工人都穿上了工作衣、工作鞋，戴上了安全帽和手套，防止碰伤。对操纵电气机械设备的工人，又另发防护用品，防止触电事故。在装卸腐蚀性和有毒物品时，更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防毒面具、胶木口罩、防护服、手套、橡皮围裙等等防护用具。

船边操作时，则挂上了安全网，防止工人失足落水；水上作业有救生衣；高空作业有安全带。这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工人们回想解放前资本家、包工头不顾工人死活，码头上根本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对比今天，更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的温暖，深深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

解放前，码头工人有四怕：怕刮风，怕下雨，怕生病，怕年老。尤其是到了年老、生病，或因工伤而丧失劳动力的时候，只有死路一条。而解放后，工人年老、有病而不能工作时，都能享受劳动保险，不愁生活，安度晚年。他们想到解放前那些被逐出码头，在马路上冻饿而死的老伙伴，更是深深感到新旧社会中工人遭遇的不同，真是感慨万千。许多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亲眼看见多少工人弟兄还没有到老得做不动，就被资本家和把头一脚踢出了码头，饿死在马路旁边。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若在过去，早已拿根小棒去讨饭了。现在有毛主席的领导，衣食无忧无虑，和过去相比，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啊！”

过去工人生了病无钱医治，还要硬挺下去，被迫替资本家、把头卖命。现在生了病就能得到适当的休养和必要的治疗，不必耽心医药费用，更不必为衣食操心。有一个退休老人，解放前腿上生过一次毒疮，没钱医治，烂了两年不能工作，生活

万分困难。解放后退休了，又生了一场大病，虽然他单身无人照顾，但是有装卸区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医药费全部由国家支出，领导同志还亲自来探望。老人十分感动，他说，党的关怀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码头上对工人的保健十分注意，有病治病，无病防病，以防为主。平时搞好环境卫生，食堂用具蒸汽消毒，现场饮水也有消毒箱。每个装卸区都有卫生站，年年进行一次体格普查。码头上的老工人过去受尽了摧残，带病的很多，经过检查，都得到了认真的治疗，身体不好的也由领导上根据具体情况安排适当的工作。

对于工人们的生产安全，更是高度重视。解放后，码头上的安全措施不断加强，工伤事故已经大为减少，即使不慎发



码头工人新居——崂山新村一角

生工伤，也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不但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而且工资照发，生活不受影响。解放前工人遇到工伤，就被资本家、包工头一脚踢开，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对比之下，使码头工人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无比热爱新社会。

至于码头工人的经济生活，同他们在解放前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情况相比，也是天壤之别。解放前被当作牛马的码头工人，在解放后才真正过到人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他们的居住条件也起了巨大变化，许多工人迁入了为码头工人建造的新村——崂山新村等。有些原来居住条件差的房屋，都经过翻建。新的建筑不断出现。



码头工人一家

在码头工人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他们的文化生活也不断丰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解放前的码头工人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不但绝大部分的码头工人都是文盲，就是他们的子女也极少能够识几个字的。解放后，码头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也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他们为革命刻苦学文化，很多老工人先后摘掉了文盲帽子，积极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码头工人的子女都普遍上学读书，在祖国的培养下幸福成长。

码头工人回忆起解放前的苦，更体会到解放后的甜。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第六章 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

一、码头盛开跃进花

一九五八年三月，上海港第三装卸区十八工作组贴出一张大字报：

“我们十八组坚决要赶上青岛港的工班效率——十八吨，希望共同跃进！”

简短有力的大字报只有两句话，二十七个大字，但却迅速地传遍了三区，传遍了全港，在几万码头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张大字报反映了全港码头工人的心愿，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全国工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展了伟大的整风反右运动，广大群众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横扫干部中存在的“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进一步调整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

生产呈现一片大好形势。第三装卸区十八工作组的革命大字报，正是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贴出来的。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标志着上海港大跃进的高潮已经到来。

十八组的大字报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青岛港是全国水上运输系统的先进单位，学青岛，赶青岛是全港工人的共同愿望。虽然第三装卸区几年来工班效率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从一九五四年的七点九九吨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十三点一二吨，三年提高五吨多，平均每年增长一点七吨。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解放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就在解放后，这样的成绩也是惊人的。但是，现在又要从十三点一二吨提高到十八吨，一跳就是五吨，相当于过去三年增长的总和。这能行吗？有的人不免有些怀疑，他们说：“十五吨还马马虎虎，十八吨怕不行吧！”但是广大码头工人经过认真讨论，找差距，挖潜力，认为只要主观上努力，这个先进指标有可能做到，他们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热烈响应十八组的倡议。他们说：“这张大字报贴得好，我们一定要办到。”三区第二、五、六、十等工作组立即以十七个字的大字报响亮地表示了决心：

“赶！赶！赶！赶上青岛港。实现工班效率十八吨！”

对十八组的大字报的两种不同看法，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历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码头工人也决不会辜负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工人们想办法，攻关键，克服困难，努力战斗，三区十八组和其他许多工作组不久都先后达到了十八吨的跃进指标。

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

民，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发展。

这股强劲的东风吹到了上海港，黄浦江两岸顿时沸腾起来，全港码头工人早就摩拳擦掌，盘马弯弓，准备大干一场。一听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家欢声雷动，干劲冲天，人人赶先进，个个争上游，工班效率就象吊杆上起货时的钢丝绳，节节上升，从十八吨一下又升到二十五吨，二十七吨……。

生产大跃进，全港喜洋洋。这里提保证，下战书；那边表决心，订措施。橡胶是一区装卸的大宗货物，长期以来是个薄弱环节，工班效率一直停留在三吨半。一区广大工人不甘心这种落后状态，坚决要乘大跃进的东风突破这个薄弱环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改进操作技术，革新装卸工具，终于搬开了这只“拦路虎”，橡胶的工班效率跃进到十吨。全港各区、站也纷纷召开了鼓干劲大会，大跃进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整个上海港，照耀得浦江两岸一片红，上海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了！

大跃进的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挖掘了生产中的巨大潜力。三区十八组在实现跃进指标过程中，碰到了船上吊杆负荷定额的障碍，影响装卸速度的提高。吊杆能不能吊得更多点，运转更快点呢？他们坚持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对有些船舶的吊杆进行反复测定和试验，发现有些定额保守了。这样，工人们从保守定额中，又挖掘了生产潜力。

工人们的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就象老虎添上了翅膀。许多长期来被当作金科玉律的保守定额都纷纷被突破，装卸速度成倍增长。

大跃进的浪潮暴露了管理工作上的薄弱环节，生产大发展，科室工作跟不上。工人每天的成绩要等上二、三天以后才能知道。领导不能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工作跟不上现场。工人们说：“这样摸瞎子怎么行呢？”在工人的推动下，领导部门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组织干部跟班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并且发动装卸区、站广大干部、群众大破大立，大整大改，改革管理体制，精简组织机构，下放业务权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精简了不必要的报表；作业计划的编制和批准，劳动力和机械的安排与使用，码头泊位的指定，都下放到装卸区、站，这样，就调动了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许多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有力地推动生产工作向前发展。

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形势给上海港带来了更加光荣艰巨的任务。原来每天在港的江轮和海轮约七、八十艘，很快就增加到一百多艘，后来更多达一百五、六十艘；每天等待装卸的货物也常常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其中大都是生产急需的物资。时间紧，任务重，形势逼人，摆在港口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发挥高度革命热情，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完成吞吐任务，为全国生产大跃进开路；另一条则是见物不见人，按常规办事，消极等待，那就是拖全国大跃进的后腿。究竟走哪条道路？广大码头工人决心最大，干劲最足，他们豪迈地提出：“当好‘先行官’，来什么，干什么，来多少，干多少，干得快，干得好”的响亮口号。在浦江两岸的各个装卸区码头上，到处红旗招展，你追我赶，人人争先进，个个夺高产；大家在劳动中比思想、比作风、比干劲、比智慧，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崇高风格，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上一班为下一班创造条件。

件，这个区为那个区提供方便，互帮互学，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战。

随着大跃进向纵深发展，码头和其他兄弟部门的协作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第六装卸区和上海铁路分局上海南站在水陆联运上原来配合得不够密切，影响装卸速度和车辆的周转。工人们贴了很多大字报，促进双方领导进行检查，召开了联席会议，加强协作，使原来每辆车的装卸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左右。铁路还提前预报火车到站时间，为码头安排装卸工作提供了便利。

大家还通过改善江海联运的协作关系，挖掘了大量运输潜力。原来江海联运的货物是由轮船卸到码头，再装上另一条轮船，这种不合理的重复作业多，浪费很大。改进协作关系后，扩大船过船的合理操作，货物直接由海轮卸到江轮，或直接由江轮卸到海轮，不再经过码头场地。既使每吨货物的基本装卸费由一元七角降为七角，又节省了人力，加速了货物周转。

码头和市内卡车运输的协作关系也得到了加强。过去，这两个部门分工如分家，各干各的，重复作业多，效率低，速度慢，浪费大量人力。改进协作关系后，卡车开进码头直接装运，减少了许多重复作业。市内交通运输部门还调配了一批卡车驻在码头，配合装卸区装卸。这样不仅缩短了船舶在港停泊时间，而且还使装卸效率提高将近一倍左右。

在蓬蓬勃勃的大跃进中，广大码头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他们奋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自觉地要求取消计件工资制。大跃进前，码头上一向沿用计件工资制，它是按照工人完成的定额多少，发给多少工

资。采取这种办法，使工人只关心个人生产定额的完成和工资收入的多少，斤斤计较个人利益，这样，既不利于相互协作，又影响工人之间的团结，严重阻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工人们早就很有意见。大跃进的洪流一来，群众干劲冲天，生产成倍增长，计件工资制这个分配方式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在这一问题上却是顾虑重重，“怕”字当头。他们怕取消计件工资，工时利用率不高，产量要下降；怕取消了计件工资，工人就会不听指挥，制度难执行。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不到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广大工人针对这种错误思想，纷纷贴出大字报，狠批物质刺激的流毒，大揭计件工资的弊端。第四装卸区一下子就贴出了一千四百多张大字报，其他各区、站的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摆出大量事实揭露了计件工资的危害性。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码头上的大跃进，难道是靠几个钱刺激出来的吗？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第五装卸区的工人们在揭露计件工资制的危害性时，指出有四个不好：钞票挂帅，滋长资产阶级思想一不好；工作挑肥拣瘦，影响团结二不好；只顾产量，不求质量三不好；影响安全生产，损害工人健康四不好。通过大鸣、大放、大揭、大议，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搞好生产要依靠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依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如果靠物质刺激，那就是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物质刺激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种企图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刺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同大跃进中工人们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相比，

显得多么格格不入！经过狠揭狠批，在工人们的一致要求下，计件工资制取消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工人们心情更加舒畅，生产的劲头也更足了。取消计件工资制后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份，港口吞吐量比同年第三季度月平均吞吐量猛增百分之五十，十一月份又比十月份上升百分之五。仅一九五八年一年中，从加快本国海轮周转中所挖掘出来的运输潜力，就相当于增加了十五艘五千吨级的货轮，可以为国家多运大量货物。这一优异成绩，充分反映了码头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和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同时也宣布了物质刺激论的破产。

上海港码头生产大跃进，装卸速度一再刷新纪录，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际友人中博得了普遍赞扬。意大利“马波林那号”的船长说，他们这条船在美国的一个港口卸货，花了整整十二天时间，而在上海只要三天半就全部卸光了，“真是快啊！”日本“博山丸”的船长对于上海港卸货速度大表惊奇，他说：“这些货我估计要卸十天，结果连五天不到就卸完了。”一艘外轮装了五千多吨货来到上海港，船长听说只要一天就可以卸完，他根本不相信，连连摇着头说：“不，不可能，装货花了四天，一天卸完不可想象。”第二天，当他接到开船通知，连忙跑上甲板，向舱口一看，惊得目瞪口呆，货物果然全部卸完了，而且只花了二十三小时五十分钟。这个船长不禁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工人说到做到，了不起，真是大跃进！”

在大跃进中，上海港的装卸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广大码头工人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继续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阔步前进。工人们说，“天外

有天，楼外有楼，上游之上，还有上游，现在只是跃进的开始，更大的跃进还在后头。”

二、卑贱者最聪明

生产大跃进也促进了装卸工作机械化的发展，加速了港口面貌的变化。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上海港码头工人过去长期使用杠棒、绳索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后虽然逐步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了部分的技术革新，工人的劳动强度有了显著减轻。但是港口装卸机械化的程度还是不高，人力操作的比重还是很大。在大跃进中，国民经济各部门飞跃发展，运输量成倍增长，很快就出现了港口装卸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英雄的码头工人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更加激发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大搞技术革新，向装卸机械化进军，提高码头的装卸能力，支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码头上的技术革新，充满着激烈的路线斗争，刘少奇的专家治厂和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束缚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有些装卸区也曾经想搞机械化，但他们依靠少数人，照抄洋资料，结果，虽然花了不少钱，拖了很长时间，却一事无成。现在码头工人要搞技术革新，究竟是跟在洋人屁股后头，一步一步地爬行；还是大胆创造，走自己的道路？是搞大、洋、全，还是土法上马，土、洋并举？是依靠少数专家，还是依靠广

广大群众？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着是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地实现装卸工作的机械化。广大码头工人在斗争中毅然排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掀起了技术革新的高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港码头工人的创造力就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决心大破技术难关，用自己的双手制造装卸运输机械。

一向被称为“一穷二白”的杨树浦装卸站，地区分散，小港作业比重很大，机械化程度很差，最好的工具不过是黄鱼车和老虎车，但却担负着沪东地区许多工厂企业水运物资的装卸任务。这个站的工人们眼看兄弟区、站的装卸效率一个个跃上去了，心里十分着急，他们说：“一根杠棒一把锹，效率怎能再提高？跃进形势逼得紧，技术革新不能少。”他们决心土法上马，开展技术革新，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搞革新，困难确实很大。全站只有三名普通修理工，工具也只有简单的榔头和扳手。但他们满怀信心，自己动手造吊车。没有图纸，就学着画，一边研究一边改。没有材料，就连夜到旧货店去“掏”。没有锻铁炉，就利用小风炉，炉火不旺，不怕麻烦，多烧几次，冷了再烧，烧了再打。没有车床、铣床，就用锉刀锉出地轴、齿轮。经过三昼夜的激战，造出一台“岔角吊”，代替了在三米高跳板上进行的人力操作。经过试用，效果良好，群众的信心更足了；接着又连续造出一些新的机械。从此，杠棒和绳子终于光荣“退休”了。工人们兴奋地编了一首顺口溜：

革新鲜花遍地开，
装卸工人造机械；

电钮一揿马达响，
千斤重担平地起。

东风猛吹革新花，浦江两岸一片红。第二装卸区的工人决心制造电池搬运车。这个区的条件也并不好，只有几名技工，设备又不足，制造电池搬运车的困难确实不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二区工人们迎着困难上，决心要攻下电池搬运车这一关。在制造中有一根五尺长的地轴，要用电钻钻眼，可是区里没有这种电钻，他们就用土风炉把地轴烧红，再用冲头冲眼，解决了钻眼问题。最后还剩下差速器的制造问题，困难较大。工人们从三轮车链轮的传动得到启发，搞了个简单的装置，代替复杂的差速器。经过五天紧张战斗，上海港第一台自制电池搬运车间世了，工人们自豪地称它为“解放牌”电池搬运车。



码头仓库作业机械化

象杨树浦装卸站和第二装卸区这样的例子，全港到处都是，技术革新的成果，象雨后春笋。什么小电吊、电磁吸铁、汽油拖车等等各式各样土的和洋的大小装卸机械，都在各装卸区、站和修配厂陆续试制出来了。特别在运输车子化方面，成绩更加显著。全港在十天内制造了各种劳动车五千余辆，基本上消灭了肩扛人抬现象，实现了水平运输车子化。

在码头装卸工作中，船上舱底的卸货作业，过去一直是靠人力操作的。费力多，效率不高。随着技术革新运动向纵深发展，码头工人决心攻下舱底卸货的关键。经过无数次试验，第六装卸区创造了一种“空中开花”的大抓斗，初步解决了散货的舱底作业问题，一个舱口可以节省二十名工人。胜利的喜讯一个接着一个。在解决散货舱底作业问题以后，全港又向包子货舱底作业进军。一区工人利用活络绳扣愈抽愈紧的原理，制造了绳扣吊货工具，他们只用几根绳子，几只铁环，解决了包子货舱底作业的关键。一个来码头参观的同志赞叹说：“你们真是土中出尖端啊！”

在技术革新运动的热潮中，码头上涌现了大批英雄人物。许多普普通通的码头工人如今成了技术能手、革新闯将。有一个工人，从来没有上过电工课，不懂电磁技术，却从玩具的吸铁石得到启发，试制装卸生铁的电磁吸铁机，经过一百多次失败，仍然毫不灰心，反复试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成功。还有一个工人，为了解决雨天也可以在驳船进行装卸作业的问题，一心要替铁驳船造一顶伞，他日夜琢磨，雨天在驳船上进行试验、观察，衣服淋湿了也毫不在意，晚上回到家里，在灯下画图设计直到深夜，经过十多次的试验，终于制成了铁驳船雨天装卸的舱伞。

谈到下雨，确是上海港的一个困难问题。上海地区多雨，每年约有将近三分之一天数要下雨，而码头装卸又是露天作业，遇到雨天，装卸工作就不能进行。但是解放了思想的码头工人决心要冲破这一关，实现雨天照常装卸。工人们在现场边研究，边设计，边试验，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开过多少次“诸葛亮会”，试制了多少种形式的雨篷。由于这些雨篷，有的抗风力弱，不适用；有的太笨重，不方便；有的搭拆麻烦，费时间，因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他们不灰心，不泄气，继续研究、试验，反复比较，最后造出了能在大型货轮上使用的“开槽式”雨篷，为解决雨天装卸问题迈进了一步。一次，正是黄梅季节，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高阳路码头靠着两艘外轮，工人先同第一条船的船长商量，准备搭雨篷进行雨天装卸，这个船长按照常规，不同意雨天装卸。后来在第二条船上使用，效果很好。前一条船的船长看到后，改变了看法，披着雨衣，兴匆匆赶到码头办公室，要求赶快搭雨篷装卸，并且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好的雨篷。

波澜壮阔的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使上海港的面貌起了很大变化，黄浦江两岸出现了“吊杆成林，机械成群”的崭新局面。一九五八年，全港机械操作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六，一九五九年又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到了六十年代第一春，机械操作比重接近百分之五十左右，即一半左右的装卸工作都由机械进行了。工人们高兴地说：

黄浦江畔闹翻天，
技术革新赛火箭；
这股干劲哪里来，
因为有了总路线。

上海港码头工人大闹技术革新，装卸工作机械化水平迅速得到提高的巨大胜利，再一次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码头工人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码头的面貌，用铁一般的事事实粉碎了阶级敌人污蔑码头工人“管不好码头”的无耻谰言。



煤炭装卸系列化

三、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日子里，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上海港的面貌日新月异，短短的时间内，码头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伟大胜利。

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上海港吞吐量逐年上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二年，吞吐量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百八十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吞吐量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当时人们已经把这种速度称为奇迹。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全港掀起了生产大跃进，吞吐量更是直线上升，一九五八年的吞吐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为一九四九年的十四点一倍。

吞吐量的增长，要求快装快卸，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前，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码头上几乎保持着几个世纪以前的落后生产工具，当时一个工班只能装卸三吨货。装卸一艘七、八千吨的煤轮，要用二千到三千个工班，装卸同样吨位的杂货轮要花半个多月时间。解放后，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广大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及由于机械操作比重的增长，劳动生产率飞速上升。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两倍半，即一九五八年一个工人的装卸量相当于一九五二年三个半工人，一九五九年的劳动生产率更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点二，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倍以上。装卸万吨级的煤轮只要一百多个工班。装卸同样吨位的杂货轮只要二、三天时间。前后对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多么惊人啊！

码头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对外贸易的数量和进出口货物的构成上。解放后，我国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航运和贸易关系，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通过上海港的。一九

五八年进出上海港的远洋轮船数目，等于一九五〇年的二十点六倍，外贸吞吐量等于一九五一年的九十七倍。更重要的是解放前后对外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前的进口货物中，消费品和奢侈品要占百分之九十，生产资料只占百分之十。解放后，进口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必要的物资；而通过码头出口的货物，不但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达到六千多个品种，而且出口的农副产品比例逐步下降，工业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一九五一年工业品出口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出口的货物中，有许多原是解放前大量输入的品种，如甘油、石炭酸、硫酸铜等，现在不但不要输入，而且已成为出口的物资了。许多曾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物资，现在，也通过上海港码头大量出口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上海港进出口货物构成的变化，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它充分显示了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上海港同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一九五八年，上海港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比一九五三年增长四倍多，对拉丁美洲的贸易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愿意同我国友好往来的国家越来越多。一艘来到上海港的阿根廷轮船的船员沙利士说：“我们希望和新中国来往。”瑞典轮“苏门答腊”号的船员说：“我们到中国后，看到新中国很美丽，社会主义的中国无限美好。”全世界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交往，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

在国内，上海港已经成为江、河、海、陆的运输枢纽。各地

许多货物都在这里集散转运。它不仅担负着上海市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工业原料、制成品和民用物资的庞大运输任务，而且对国内各地物资交流，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南北沿海和长江的大量物资在这里中转联运。工农业所需的矿石、化肥等等也从这里大量转运各地。同时还从这里运出大批人民生活所需的日用百货。一九五八年，通过上海港换装转运的货物占港口吞吐量的一半左右。

蒸蒸日上的上海港，真是千轮万船进出忙。刚刚送走了开往拉丁美洲的大船，从非洲海岸来的巨轮又已靠岸；开往青岛的货船刚出吴淞口，来自大连港的班轮又已进口。黄浦江上，万船云集，码头上，货物如山，轮船的汽笛声，机械的轰鸣声，货物的起落声，谱写出雄伟欢乐的乐曲。这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真是个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啊！

总路线光芒万丈，大跃进战果辉煌，正当全国人民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群众运动的洪流一浪高过一浪向前推进的时候，不甘心灭亡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总是窥测方向，妄图进行破坏和捣乱。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彭德怀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反革命罪行遭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上海港码头工人愤怒地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种种反动谬论，坚决排除修正

主义路线的干扰，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跃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九五九年的港口吞吐量又在上一年跃进的基础上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胜利。但是，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自己的死亡，总是要进行疯狂的反扑，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之流，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刮起阵阵妖风毒雾，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依然尖锐地存在着。

码头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进行激烈搏斗的阵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码头引入资本主义邪路；一些混进职工队伍的阶级敌人也乘机蠢动，兴风作浪，阴谋复辟。广大码头工人在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牢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顶妖风，战恶浪，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场急风暴雨的大革命迫在眉睫。

